北京服装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

清末民初天津地区服饰

姓名：张海容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设计艺术学

指导教师：表仄

2000

摘 要

327880

论文讨论了清末民初天津地区服饰发展变化的过程，整个时期被分为三个阶段：19 世纪晚期及 19、20 世纪之交，民国建国，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论文分析了当时服装的发展过程以及天津地区服饰的独特之处，也为中山装起源和旗袍演变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关键词： 清 末　　民 初　　天津地区　　服 饰

指导老师： 袁仄教授

ABSTRACT

The thesis discusses the contemporary fashion of Tianjin reg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time.The whole period is divided into 3 phrases, later 19th century and the joint of 19th century and 20th century,the establishment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1920's and the 1930's.I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fashion of that time and the distinction of Tianjin region which makes it differ from other regions, it also provides some data for the subject Zhongshanzhuang Suit and Mandarin Robe (QiPao).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early republic time Tianjin region fashion

Directed by **Pro.YuanZe**

0. 前 言

《清末民初天津地区服饰研究》一文讨论了由清晚期开埠到30年代沦陷这一段时间内，天津地区服饰变化的过程。

这一题目是整个近、现代服饰史研究的一部分，继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服饰之后，继续探讨近、现代服饰，并强调天津地区的地域性。近来，西方时尚界的流行趋势发布选择了"近、现代东方服饰"作为主题，可见近现代服饰史研究可以为流行趋势提供很多"主题"，为设计提供文化背景的参考和灵感。由于服装设计还担当着社会思潮、社会文化代言人的作用，因而服装史的研究更要尽量还历史以真实、全面，避免因情报的疏漏、肤浅，使服装传达的信息流于表面。服装是轮回的，一部服饰史不允许断档。

当然，这一研究并不仅仅限于服装设计之用。

服饰史不仅仅是服饰本身，有必要提及的是以下一段别有意义的谈话：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有影响的中国领袖人物的心目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逐渐变成了一个令人不得不佩服的形象，中国人对日本制度技术和变革作出的努力流露出赞叹甚至钦佩之情。1875年的纠纷解决后日方代表森有礼来北京，李鸿章与他进行了一次引人入胜的谈话，李对日本想与东亚文化传统决裂的意愿表示意外和震惊：

李（鸿章）：我对贵国近年来作出的几乎一切成绩都深为佩服，但有一件事我还不很理　　解，这就是你们把古老的民族服装改成欧洲式样……服装是激起对祖先的神圣回忆的事物之一，后代理应以崇敬的心情永远保持下去。

森（有礼）：如果我们的祖先还活着的话他们无疑会做我们全部做过的事……大约一千年前，他们改穿中国服，因为他们发现中国服比原来的穿着要好。

李：你如果出于理智，就应该穿中国服……它很方便……而且完全可以用国产的材料制作。

森：你们四百年前的祖先谁也不愿意改成本朝开始时候的服饰（即留辫子）。但毕竟发生了变化，不过你们的这种变化是强加给你们的，尽管你们不喜欢它。

……李警告森不要过分西洋化。[1]

这则谈话揭示了一段值得惋惜的历史，一个被"中央大国"称为区区岛

国的"小国"因为改变而可以藐视巨人——这种改变当然也包括衣着上的，而我们的改变、包括衣着，是被动、是挨打，我们不得不面对感伤的、充满嘲笑与欺凌的"瀛台落日"——通过衣着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部历史，而且看得更加细致、更加有动于衷。

在结构上，笔者试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民国前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几个大的历史段落隐约把握服饰上的变化。本文没有以正史断代所依据的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服饰历史时期的界限，其原因是，就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看来，首先，洋枪洋炮并没有给服饰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与华夏民族史上几次改朝换代不同，清末外人来犯并没有颠覆政权取而代之，所以不必要消灭前朝遗迹；其次，中华民国适属民主共和国，建国后虽然颁布了服制令，但未采取"留发不留头"等极端的专断手段，同时由于民主革命进行的并不彻底，因而，由封建王朝到民主共和的更迭与改服易袍之间关联的程度也不甚深。只是在这些过程中人们旧有的意识渐渐松动，才带来了服饰上的变化，当然，民主革命和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对服饰的变化仍然很有意义，建国带来的民主思想使服饰得以渐渐洋化。这一时期，服饰更多地受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的牵动，而不是被政治事件直接左右的。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而一种服饰由出现到普及的过程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本文在写作时是以时间为主线，每个时间段内分若干专题，专题的选定和划归的依据是，每个时间段内最重要的特点、最显著的特征即定为该时间段的专题，但这一专题中的内容并不一定始于或截止于该时间段。因为关于近代服装史已经有过一些优秀的论文，为避免重复，如没有新资料，笔者尽量避开他人作过的专题，没有面面俱到。因为资料有限，对有一些专题也是点到即止，待将来有新的资料问世时，再继续探讨。本文只是为今后的研究搜集一些背景资料。

注释：

[1](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400页

1. 十九世纪后期及世纪之交的天津服饰

近代天津服饰的变化主要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天津开埠前后开始的，十九世纪中后期至二十世纪这段时间天津城逐步走向近代化，人们的旧有的着装方式及意识渐渐松动。由开埠及洋务的兴办起始，沾上吹来洋风，天津的纺织业开始起步。洋布与土布在市场上各有优势。外国人在天津的租界里保持着固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以独特的服装文化影响着天津人，洋货、南货被天津人广泛地使用着。

1.1 旧有着装方式及意识的松动

1.1.1 天津城区的近代化与旧有着装方式、意识的松动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部，海河下游，濒临渤海，水陆交通便利，港口腹地辽阔，很早就是漕运枢纽，是拱卫京畿的战略要地。正如冯骥才的描写：

天津卫这地界，是老天爷打天上割一块扔下来的。俗话说，有条河，就好活。可是天津卫愣把北运南运永定大清子牙五条大河，拢到一兜儿，跟手装进身边的汪洋大海。这就有鱼有虾有米有盐有碱有卤有豆腐有河螃蟹海螃蟹有小木船大火轮，左边守京都，右边开租界，有吃官饭的，有吃洋饭的，小百姓专吃猴手里掉下的枣儿，大伙就折腾开了。吃官饭的，折腾品载权势座次俸禄升迁远近亲疏；吃洋饭的，折腾洋货洋钱洋人；老百姓折腾穿住买卖铜钱。[1]

近代天津的繁荣是以城区的近代化为标志的。当北京还是满城土路的时候，天津已经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1860年10月24日、25日，中英、中法《续增条约》(即《北京条约》)相继签订，天津开埠，成为通商口岸，[2]从城市发展阶段看来，开始由传统期步入转型期，即由一个封建性的交通枢纽和商业城市，逐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工商业港口贸易城市。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人流和物流的载体，是发挥城市诸功能的和中心作用的物质基础。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天津奠定了近代港口贸易与工商业城市的地位，20世纪以后，为适应城市成长的需要，各项基础设施开始得到发展。首先是电力，天津第一家发电厂是1902年由法租界建立的，仅仅供本租界使用，天津最大的发电厂于1906年由比利时商人和

中国政府合作建设；其次是排水，1901年建设的济安自来水公司是当时最大的自来水厂；街道是城市的血管，是城市物质流动和人流的纽带，20世纪以后，天津街道的修建发展迅速，在旧城区的基础上开辟环城马路，袁世凯经管天津时期(1902-1907)，修建了南北和东西走向的干道，并制定了管理街道的规章制度；桥梁也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第一座铁桥是1887年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兴建的；交通工具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汽车出现于1903年，几乎与上海同时，汽车的出现刺激了城市官僚富商和外商购买的欲望，以显示其地位和雄厚的财富，天津的汽车数量逐年增多。有轨电车于1906年出现，(公共汽车出现较晚，时间是1925年)这大大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第一条沟通天津与外地的近代化公路是京津大道(1928年通车)，后来又修建了津保公路等埠际间和连接天津与内地的近代公路。

天津开埠以后，各租界里出现了一些西式建筑，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天津城市的近代建筑有较快的发展，大致有公共建筑、娱乐建筑、居住建筑和工业建筑等；城市里的公共公园和绿化对城市环境质量和保持自然生态平衡有着重要的作用，是天津城市近代文明的标志。天津从一个外国人眼中"最肮脏最骚乱也是最繁忙的城市之一"，变成了带有西洋文明气象的近代城市。

天津城区近代化也带来了城市生活的改变。西式的消闲生活冲击着中国城市居民。"外国侨民春秋两季的赛马活动，竟使天津'倾城士女，联袂而往观'，'或驾香车，或乘宝马，暖轿停留，或小车独驾。衣香鬓影，尽态极妍；左顾右盼。听奏从军之乐，畅观出猎之图，较之钱塘看潮万人空巷，别有过之而无不及'"。[3]人们从长期的封闭状态下解放出来，也可以在公共场合较为自由地展露自己的衣着和仪态了。

开埠之后，尽管服装改革为中国统治阶级所不齿，但天津"服饰和习尚仍从方便实用的角度悄悄地出现了小改小革的趋向，尤以为外国侨民服务的下层人员为甚。"[4]《津门杂记》中说，"紫竹林通商埠头，粤人处此者颇多。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又如衣襟下每作布兜，装置零食，取其便也。近则津人习染，衣襟无不作兜，凡成衣店估衣铺所制新衣，亦莫不然。更有洋人之侍童马夫辈。率多短衫、窄裤，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5]冯骥才小说《神鞭》是记清末事的，鉴于冯骥才不仅是小说家，还有学者的身份，多年研究天津历史，同时收藏古旧服饰品，故而，其书中对服饰的描写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清末稍稍洋化的天津下层，《神鞭》中谈道：

古铜色湖绸套裤，裤腿紧缠着宝蓝飘带，净袜乌鞋，上身一条半长的深枣色红拷纱袍子，挺象本地小闹佬，可袍子外边紧巴巴套着件没袖没领的小

短衣，象马褂又不是马褂，倒象张七把摔跤时那件坎肩。这件小衣做工挺考究，上边耷拉着怀表链，胸口上还挂着七八个稀奇古怪、不金不银的牌牌儿。有在鸟市看过洋片匣子的人，认出这是洋人身上的东西。可是他帽翅上插着那小梳子干吗用？广东娘儿们好在头发上插一把梳子，随时拢拢头发，但从没见老爷儿们玩这套。别看这小子一身四不象的侍打扮，还挺得意。好象人人看他这身穿戴都眼馋。[6]

1.1.2 僭越

清代天津城市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商人的倡导和世俗化的倾向，天津城市社会最显著的特点是商人与官宦身份的结合。按照传统文化，对商人的衣着和鞋子的色彩都有规定，商人不可穿太奢华的衣服。[7]但"天津是中国传统中晚近出现的城市，又系商贾通津。商人在城市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兼有两重身份"，另外，天津离开皇城，又有洋人的势力，恃洋无恐，加之清王朝气数将尽，内忧外患，无暇顾及，所以天津地方在服饰上、礼仪上，常有僭越的情况。

天津商人穿毛、丝绸的很多，颜色、文饰的禁令也不顾忌，明黄是皇帝的专有色，但有的天津人照样穿，富有男子的袍子全身福寿字团花（依天津历史博物馆顾道馨先生说）在今人藏的服饰品中也可以见到普通人的马褂开四楔的（依天津服饰品收藏家何志华说）。

对于一般的封建礼俗，天津人也比较淡薄。比如婚姻"不拘六礼，但以通媒为定，不计财礼，不侈妆奁"，甚至"承凶而娶，居丧而聘"。[8]

1.2 沽上洋风

1.2.1 洋务运动与清末天津纺织业

天津的民族工业在清末，不仅落后于上海，广州和武汉，而且也落后于江苏南通、浙江宁波、河南安阳等地，那时，我国发展最快的就是棉纺织业和面粉业，而天津仅有的几家规模极小，基本上是个空白点，纺织业只有一个五千枚纱锭的官办的直隶模范纱厂，天津只占全国纱锭总数的1%强。[9]在这一时期，天津的国内纺织业并不兴盛，因而，本国纺织业能给居民衣着面料带来什么变化也就无从谈起了。直到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情况才有了转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和国内洋务运动的兴起，[10]以及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的引进，天津民族工业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虽然起步迟、规模小、技术力量差，但工厂数量的明显增多、行

业的扩大，已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但是，尽管十九世纪后期，天津是北方的洋务中心，但洋务运动是以军事工业为主，民用工业则以航运采矿等为主。[11]

1.2.2 土布与洋布之争

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洋布对中国土布的冲击是清末的重要现象，清末土布生产的盛衰及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地位的升降，是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下，中国社会经济不断发生变化的反映。

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棉布生产的影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英国棉布的对华输出，开始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但贸易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世界上一般国家的发展道路是纺和织分离，然而在中国由于自然经济的影响，一直无法实现纺织分离。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农家的手织布是国际市场上的宠儿，备受欧洲有钱阶层的青睐，英国人把蓝底白花的中国棉布叫做"南京布"，人人以穿着"南京布"为荣，似乎没有这种中国棉布裁制的服装，就难以登大雅之堂，甚至连改变了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伟大的产业革命，从某个意义上说，也与中国棉布对英国的输出有着深刻的联系。当时，亚洲的棉布（包括印度和中国）潮水般涌入英伦三岛，国会用立法也无法阻止。中国的手织布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催生婆，实现了工业化的英国棉纺织业反过来又对中国的手织布产生冲击。当时，对洋布排挤土布的情况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其中以郑观应的说法最为耸人听闻：

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城市，衣大布（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12]

这种说法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从统计资料来看，这种说法的正确很值得商榷，穿洋布的大约以通商口岸地区和城镇居民为多，而内地乡村与之相反。内地的方志材料记载说："民俗多好土布，以其质坚耐用也。……于时以服自织布为贵，布质密致耐用，平民一袭之衣，可御数载。"[13]这一时期中国销用棉布和机布只占不到1/7，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和城镇地区。从1895--1914年的20年间，新开放通商口岸53处，比过去半个多世纪开放的还要多，进一步便利了外国商品的对华输入，棉织品取代了前一时期的鸦片成为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占到进口总额的1/3，在这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棉织品对中国的倾销。日本商人允许经销棉布的中国商人先赊购，交款也不一定用现金，而可以用大豆、棉花等代替，因而这一时期日本棉布进口猛增。土布遭受洋布冲击的情况，在不同地区有很大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到20年代初，洋布进口减少，土布再度卷土重来。

经过从鸦片战争前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近一个世纪的竞争较量，进口洋布始终没能对手织布形成优势，在中国的棉布市场只分得一个很小的份额，国内的机织布参加了这场竞争之后，形势才发生逆转，手织土布开始不断退却。[14]

以上是全国范围内的情况，就天津而言，19世纪初，它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棉花集散地，也是我国棉花输出和棉纱、棉布进口的主要口岸。[15]开埠之后，"天津的洋布进口量已超过上海和其它的通商口岸，位居全国之首，成为全国重要的洋布输入和集散中心……据计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天津每年进口的洋布，可供当时直隶山西两省每人作三件成人衣服……天津进口的洋布已基本占领了临近省份的市场。"[16]天津应属于居民穿洋衣较多的通商大埠之列，但如果一味认为洋布占了很大的上风则有欠妥当。

关于天津洋布，《津门百咏》有诗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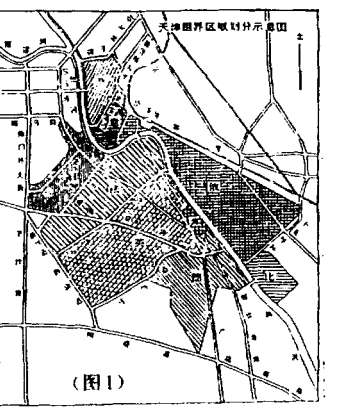
百宝都从海舶来，
玻璃大镜比门排，
荷兰琐袱西番锦，
怪怪奇奇洋货街[17]

荷兰琐袱是指哔叽，西番锦指印度绸。（另见2.4洋货在天津）

1.2.3 "万国博览"
——天津租界服饰

天津开埠后，租界的存在是其重要特征，从1860到1902年间，先后共有英法德日俄意比奥八国在天津设立租界。[18](图1)

吃洋饭——与洋人打交道、穿洋衣——生活方式洋化成了天津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在津外国人以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生活。外国人首先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律制度而拥有了一定特权，这是他们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基础。[19]英法德等老牌资



（图1）

本主义国家介入早,在天津有较强势力,"天津的租界区由七个不同的国家管理,包括三个英国独立的市政区、五座教堂、八个网球俱乐部、五个狩猎庄园、七个不同国家的协会、七个社会俱乐部(英国的天津俱乐部最老、还有德国的联谊俱乐部、法国的剑术俱乐部和日本俱乐部等)及游泳、曲棍球、棒球、板球和高尔夫球的俱乐部,当然还有赛马俱乐部,它在1901年新建了一座精美的大看台,以代替被义和团所毁的旧看台。市图书馆位于英租界,藏书7000册,从1914年起英国人伍德海主编了《天津时报》(他又是《中华年鉴》的主编和发行人,以与日文的《天津日日新闻》、法文的《津郡权务报》和德文的《北洋德华日报》进行竞争。"(20) 日人通过天津日租界向华北倾销过剩商品,尤其是棉布。[21]

逃亡来津的沙俄贵族后裔被称为白俄,他们大多居住于俄国租界内。

"白俄对穿衣打扮也很讲究,在小白楼一带有不少白俄开设的鞋帽店、服装店,以及洗衣房、理发房等。亚历山得拉太太在今曲阜道开设了一个亚历山得拉帽店,雇佣中国女工和童工,专门制作女帽,兼制乳罩。巴甫兰阔兄弟在今解放南路经营波拉帽店,专售各种男、女帽。鞋店前有面提到过的格鲁施阔夫在今解放路开设的欧美靴鞋店。服装店有甘努尼阔娃太太在今马场道开设的时式女服店,来自哈尔滨的海伦·耶律米娜太太在旧德租界二十四号路(今广东路)美国大院内开了一家服装店,专做各种女服,还做结婚礼服和长纱,并替教会做祭衣。

有些白俄开设理发店,多在小白楼一带,主要为白俄和外国人服务,比较高级,美其名为美容馆,仅解放路上就有三、四家。其中卡浦云欧美容馆的职工都是白俄女子。皮卡狄丽美容馆的规模最大,店里有化装师和修指甲师。在解放路的利德顺饭店(今天津饭店)和泰来饭店(今天津第一饭店)各有一家租用门脸的理发馆,前者是阔列涅夫美容馆,后者是由尼娜·考斯特洛娃小姐和露西·考皮叶夫卡娅太太合伙经营的尼娜和露西美容馆。"[22]洋人将他们的生活方式、着装方式带到了天津。

由于租界能为工商业提供所谓"保护",一些租界成为消费行业聚集的地方。当时法租界消费行业充斥,当然少不了服装首饰等行业。法租界聚集了众多的中外巨富,"于是从衣食住行到娱乐声色,各行各业应运而生。领先出现的是今哈尔滨道的宁波帮倪元记、王阿明等西服店,相继于梨栈、劝业场一带有李同益、裕泰、徐阿明等很多西服店开业,共有二十余家。随着法租界内华人富户增多,经营绸缎鞋帽、钟表首饰、木器家具、医疗饮食等等商店纷纷开设。其中较大的绸缎庄有谦祥益、大纶、元隆、敦庆隆、华竹等七十余家,鞋帽店有盛锡福、德华馨、同仁和、同馨和、金九霞、沙船等五十余家。钟表行有慎昌、亨得利、亨达利等;金银首饰店有物华楼、恒利、三阳、三义、顺成等。"[23]

今天著名的小白楼一带最初英法美在天津设立租界时是美租界，1902年并入英租界。“这里的华人经营的小型店铺比较多，顾客几乎是华洋各半，故而应酬小市的人多少都要会一些业务应用英语，所售商品和加工服务，也要适合西洋习惯和风味。”[24]这里的服务业有西式食品、日用杂货等，西式服装裁剪很著名。

租界还是遗老遗少、军阀官僚的避风港、养老院。其中尤以英日租界为突出。英租界“自辛亥革命前后至‘七七’事变，在英租界做寓公的军阀、官僚、遗老等，数以百计。北洋政府时期的五个大总统，其中有四个都和天津英租界有密切关系。”[25]溥仪避居的张园是在天津日租界内。

在租界内的消费娱乐中心西式服饰、首饰业，还有与时尚相关的服务业已有相当规模。后来的小洋楼文化、二十、三十年代天津人衣着洋化的蔚为大观是与租界文化打下的基础分不开的。

1.2.4 洋货在天津

天津开埠之前，洋货由香港、广州、上海等地运来，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划定租界，设立洋行倾销商品，把天津变成为外国商品的销售市场，并大量掠夺我国土特产品，运往国外加工销售。天津洋货非常畅通，冯骥才的小说中谈到：

（广来洋货店的老板）杨殿起专门倒腾洋货，卖美国斜纹布，英国麻布，日本的丁字布和绉纱。各国的瓷器、金属器、纸张、烟卷、针线等等小商品也够齐全，这几年，喜好洋货的人渐渐多起来，有人见洋货得使，有人买个新鲜，有人以洋货为荣，这就使他的买卖愈做愈赚钱。[26]

天津人与洋人有不得不打的交道与打不完的交道。开埠之初，天津有人以赶洋为谋生手段。“‘赶洋’这个名词是由‘赶毛’演变而来的。外国轮船源源驶入海河，停泊在码头靠岸，大批船员水手们都要登岸购买各种食品和日用品，有些商人为了多赚钱，将商品搬到海河码头，卖给外国轮船上的大副水手们。早年人们对外国人都称‘毛子’，所以把这部分商人称为‘赶毛的’。后来由于海河淤塞，轮船吃水过浅，外轮不能驶入码头靠岸，改在大沽口外停泊，因此‘赶毛儿’的也就随之消失绝迹了。”[27]

洋货的聚集使洋货行在天津形成了一定规模，天津有洋货街的存在 。“‘洋货街’在天津有两处，店多成市，洋货（实际是江浙闽粤的仿制品居多）在天津的销路可想而知了。”[28]

当时人的诗中有咏洋货的句子。《津门小令》有诗道：

津门好，市上好徘徊。

洋镜朗开银世界，
采舆高结锦楼台，
观望几疑猜。[29]

《梓里联珠集》注道："洋货街在北门外，玻璃灯镜，罗列高下，入其中者如分亿万化身。娶妇彩轿高丈余，上用玻璃、红绿帛装成，重楼复阁形。"[30]《津门百咏》中"玻璃大镜比门排"一句，也谈到了大穿衣镜。《红楼梦》中所写的贾府中的稀罕物，在清晚期的天津却随处可见。

当然，天津毕竟曾经是中国北方的传统城市，洋货的使用并未使天津人从生活到意识全盘洋化。"天津对西洋人的意识形态和技术产品是区别对待的。对待洋货，凡是对生活带来方便、享用的可以接受，对洋技术也积极学习、运用，在民间首先是仿建洋楼和改进中式房的建筑形式和设施。而于思想意识是东西采取了保守态度，看重中国传统。即以洋教而言，西洋人到处建教堂，深入民间传教，老百姓不接受。民间对个别入教者则讥之为'在直眼儿的'，甚至加以歧视。晚清反洋教运动能在天津轰轰烈烈展开是有其社会心理基础的。"[31]

1.2.5 南礼与北礼

得天独厚的水陆运输，使天津成了南北物品的集散地，在天津，没有买不到的东西，也没有卖不出的货物。粤闽潮帮发祥于天津针市街，他们于康熙年间即抵达天津，从此，广货北来；天津开埠之前，广帮由香港运货来津，以熟悉洋务、地近香港的条件兴盛于天津。经营行业应有尽有，著名行业有二十余个，其中有进出口业、百货业、皮革业、化妆品业、紫檀红木苏木业等，包括大小商号二百余家。[32]

清乾嘉时期江浙、闽粤商人大量北来，带来南方物产，广货与洋货几乎同等重要，其中日用百货如针、花边、脂粉等因新巧精细艳丽，成为奢侈消费品，在中等以上的家庭中流行一时，即所谓的"洋广杂货"。天津方言即以日用百货店称作"广货铺"，在旧城区民间口语中流传到本世纪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33]

《津门百咏》也谈到南货局：

居奇无货不苏杭，
三倍虾蟆价更昂。
莫怪门中开内局，
从来大贾要深藏。[34]

由于南方人的进入、南方货的常见，清末天津在社会礼仪方面有南礼和北礼之分。南礼为居津的南方人所遵循，北礼为天津土著和北方几省进天津的人所重。南礼精巧轻灵、北礼大气厚重，以订婚的婚帖为例，南礼订婚帖如现今的大信封大小，北礼的则要有四个十六开大（据顾道馨先生说）；在服装上，南方服饰勾栏（栏杆）繁复、北方简洁（据天津民俗学家张仲先生说），南方女袄底摆多圆角，北方多直角（据何志华先生说）。

1.3 十九世纪中后期、世纪之交的天津服饰

1.3.1 女子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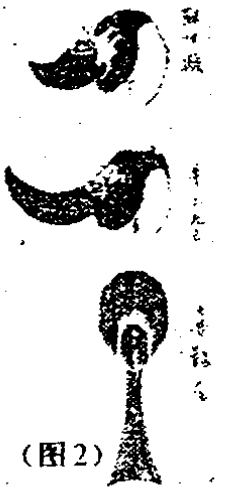
发式：清代妇女发髻形式很多，大体说来可以分做圆长两种，髻的部位普通都在脑后，也有梳在顶上或两鬓边的。髻的形式各有不同。清初，天津有“卫头”，髻样高起前向。延续时间较长，《竹枝词》中说到卫头有这样的描述，“随时百物递更张，无论城中与四方，只有人家云髻样，多年不改旧时妆”。“卫头”要将发髻树立得呈高起而向前倾的形状，施以名贵的桂花母子头油，外地人称之为“卫头”。一般妇女则时兴挽髻，“旁有两尖，形如张扇”，并“用铜丝穿茉莉插鬓”。仕宦人家妇女，则留“元宝髻”，这是一种南方发饰。[35]

清晚期，高髻渐渐趋向长髻，天津开始流行“平三套”、“苏州撅”、“喜鹊尾”等。（图2）关于妇女梳苏州撅的装扮，冯骥才书中的描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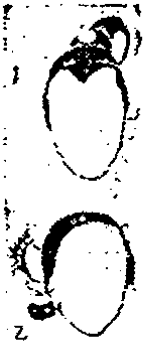
她坐在一张铺着乡花垫子的靠椅上，戴着翠戒指的雪白小手有姿有态地往扶手上一摆：在她的身后，站着一个老妈子，头上梳着苏州撅儿，横竖插满串珠、绒花、纯银的九连环簪子，足登小脚细羊皮靴，青洋绸肥腿裤，月白色大襟褂子绷着四寸宽的花袖箍儿，襟口掖着一条纺绸帕子。[36]

老年妇人，多半在脑后把发结成圆形，中间用扁簪压住，扁簪长约一寸半，工致的簪身有许多花纹，材料多用金属。髻上罩着一个硬纸或绸缎做的“冠子”，冠子也叫高冠，直径约两寸，深约半寸，黑色，绣吉祥花纹，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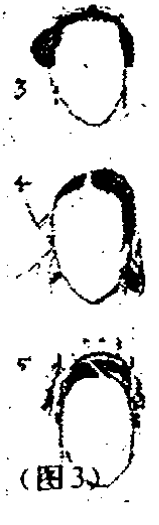
为团寿字，上边和左右两边各有小空，冠簪插上头，冠簪的形式与大头针相似，材料多用金属。中年妇女梳髻，外罩硬纸糊黑绸缎作成的“篡”，篡仅有两壁，上下是空的，形状像一只无底鞋，四周围插各样小簪子。除此之外，梳髻有专门佣工，约三、四天一次，为了保护髻形不松散要涂油、腊和刨花儿水。平时髻发松乱了，也有用油胶等物去抹拭，叫“抹头”。为不伤髻底，睡眠要用硬枕具，如“木墩儿”、“磁猫”等。这是重要的妇女习俗。未婚女青年梳单辫子，少女则有双丫髻。约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兴梳盘髻，天津叫“盘头”，有“连环髻”、“元宝髻”、香瓜髻”、“盘辫髻”等。年青的留刘海发覆在额上，形式有“平剪”，“燕尾垂丝”等。


(图2)

头面的另一问题是额角的形式，共有五、六种，圆满、垂满两种在天津比较流行。(图3) 另外画眉、敷粉、簪花，戴耳铛也是头面装饰的项目，也有各种传统。[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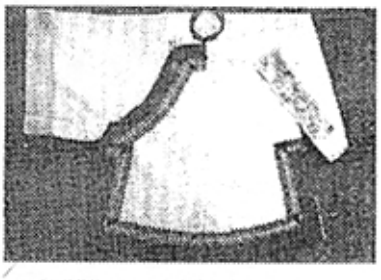


户外装：清代天津是封建商业都市，由于受封建商业活动的影响，讲求衣履，注意质地，颜色、样式和缝制技巧。表现出凡外出，亲友往来或节日都要穿色泽明快鲜美的丝绸衣着，俗称“逛衣”。


(图3)

日常装：清初汉族妇女仍沿用明制，以上身着袄衫，(图4) 下身束裙为主，或者再加上一件较长的背心。到后期则改为下身不束裙而只穿裤子。裙子，除朝裙外，一般妇女的裙子没有什么规定。清代的裙子都系在上衣之内。颜色以红为贵，孀妇一般只穿黑裙。若上有公婆，又寡居多年者，也可穿雪青或湖色裙子。裙子的式样很多，常见的有百褶裙，凤尾裙等，清代妇女穿的百褶裙是沿袭明代风尚，到咸丰、同治间又兴起将裙褶幅用丝线交叉串联的“鱼鳞百褶裙”，风行一时，很为妇女们所喜爱。其裙褶处能张展紧缩，展时如鱼鳞式。“凤尾如何久不闻，皮棉单夹弗纷纭。而今无论何时节，都有鱼鳞百褶裙”即是《竹枝词》中概括这一时尚的诗句。关于女子装束，冯骥才小说中写到：

桂花拿出当年出嫁过门那身行头。这套行头即使前些年过年也舍不得穿出身儿。上头是五彩夹金线三镶三滚满花红袄，下头是元青百褶鱼鳞裙，样



(图4)

式花色料子虽老虽旧，赛戏装，又压在箱底多年，有股樟脑味儿，可这老东西有种沉着劲，雍容华贵气，新东西没法比儿。人配衣裳马配鞍，往常那种穷气贫贱气倒霉气全没影了，再在额头抹粉嘴唇抹油腮帮抹胭脂，香瓜髻上插两朵玉丰泰大红花，一副喜庆相，换天换地换个人。插花还给二奶奶鬓角插个大金聚宝盆。[38]

裙前面无褶处，称做“马面”，可绣各种纹饰。天津妇女穿裙是学习南方习俗套在裤外，古又称“裤裙”。妇女们“扮番装”也只在照相馆里穿一下，摇身在镜头上一变为“番妹”，穿起来在街上扭来扭去可以说是少有。在上海香港，间或可以看见，但在内地是绝对不流行。[39]

配饰：清代妇女束腰带，大多束之于上衣内，开始比较窄，用丝编鞭而下垂流苏。光绪中叶以后，因裤外不再束裙，妇女多系考究的绸带，带端绣各种花纹垂于臀边，有的垂至腿边，带长及膝，露出约一尺有余，也有将流苏缝在带端，走起路来出现轻微摇动的效果。这种装束在当时正统观念指导下，显得不太庄重，往往被人轻视。光绪末年，女服身长过膝，更加使用大镶滚的装饰工艺，服色以湖蓝，桃红为多，也有用宝石蓝和大红等色的。

腰上佩带的饰物，有玲珑玉件，以及绫、纱作成的囊袋，内装兰麝异香。《津门小令》中云：“津门好，囊袋剪青红，绫碎堆成花鸟细，纱轻穿就草虫工，佩玉缀玲珑。”可见囊袋做工的精美细腻。

妇女手帕颜色不拘，出外随身携带，但常手持或串于襟上。

鞋：天津妇女穿鞋很讲究，平时穿“梅花底”鞋，也有“杂剪绫帛作云幅勾连”的“云鞋”，闺中新妇则穿“踩堂鞋”。清中叶以后，又兴起夏日穿短靴之风，为天津本地独有的风俗。

1.3.2 男子服饰

首服：除“瓜皮帽”之外，还有风帽，天津方言称做“观音斗（兜）”。因与泥塑或绘画中观音大士像所戴头巾相似而得名，有夹、棉、皮几种，是老年男人冬日遮蔽风寒所用。此帽由左右两大片于当中缝缀成形，头部可遮至前额，两边有带，可系于颏下，自此向后披于两肩及后背。明代已有此物，清代布面多为黑色，呢面或缎面者有紫色、兰色、黑色数种，四周镶有他色缎边的，多属家庭自制。戴时须有瓜皮帽套于内。

中年商人则戴“将军盔”，是一种冬日防风御寒棉帽，因形制大致与明清军官所戴皮帽相似故有此名。面料有缎、布两种，均为黑色，里衬黑布夹薄棉一层。顶部一如瓜皮帽，从齐额处开始左、右、后三大片连缀至肩，仿佛盔甲的护顶，惟后片长于左右两片。三片上多用黑线纳花或绣寿字，纹饰或三者相似，或左右对称、后者另作一种花纹。戴此帽者多为四、五十岁商人，三十年代绝迹，而将军盔的改进型——“恭禧帽”则流行到四十年代。

再有一种是“毡帽头”，多为农民及市井劳动者所戴。

常服：男装主要是长袍、马褂，马褂身长不过腰，袖子较宽，及至近代仍沿此俗。

袍分棉、夹、单几种，是一种衣身较长至脚面的外衣形式，多为男人常服。袍服一般无领，穿时需在袍上另外加一硬领，这种领子又叫“领衣”，这种长袍多有开禊，但也有不开禊的，俗称“一裹圆”，是一般市民的服装。袖口为马蹄袖的，为一般礼服。在长袍之外，上身都加穿一件马褂，长仅及于脐，有对褂、大褂和缺褂之别。对襟马褂多当作礼服，大褂马褂即衣襟开在右边，多当作常服。这种马褂袖口平齐而宽大。初期领袖边多有镶滚，及至晚清，已经没有什么镶边了。

马褂之外，又有马甲（天津称“坎肩”），男女皆可着，马甲也有大襟，对襟，琵琶襟诸式，但对襟最为普通。至于普通的劳动人民则主要以“短打”为主，便于操作。

北方天气寒冷，因此有扎腿习俗。旧时连裆裤比较肥大，里边不再有贴衣裤，特别是北方冬天穿棉裤后，顺裤腿进冷风，因此在踝骨上部用布带将裤腿扎紧，防止进冷风。这种布带（后来为线带）津俗叫“腿带子”。腿带子有宽狭之分，末端有流苏垂于脚踝之处，冬天棉裤自然如此，春秋穿单裤也有这样扎紧的，以至造成踝骨以上部位肌肉萎缩。

配饰：在清代与男服相关的还有佩饰习俗。男人袍外系腰带，用来挂各种饰件。也有在右肩疙瘩处悬挂的（此种佩饰常见于一般市民）。饰件名目多样，常见的有荷包、火镰、剔牙签、耳挖勺、眼镜盒、小胡梳等。仅荷包一

物，就有多种，质料、造型各不相同，名目也不一样。这种佩饰习俗，既有装饰意义，又有实用价值，三十年代往后渐渐消失。手帕也是一种既实用又可做为装饰的生活必需品、男人多用白绸或白布手帕，携带时藏于袖管之中。[40]

以富家子弟而论，在清代中叶，平时讲究穿着一种介于红黄之间的"军机色"长袍，外罩镶平面洋钮的巴图鲁坎肩。头戴帽沿前低后高、插双貂尾的"耍帽"，腰挂侍卫袋——长杆大烟袋，足踏鞋头镶有云朵的夫子履。在近郊狩猎时，则换穿半肩军机短褂和双底薄式武备尖靴。每到夏日，则手执团扇，衣状元罗衫，配以香珠。[41]

关于男装，冯骥才书中写到：

……撩起轿帘，打里边走出一个老者：清瘦脸儿，灰白胡子，眉毛象谷穗长长地从两边耷拉下来；身穿一件扎眼的金黄袍子，宝蓝色贡缎马褂，帽翅上顶着一块碧绿的翡翠帽正，镶在带牙的金托子上。[42]

今儿大伙打头到脚，打里到外全是一身新。惹惹头上一顶崭新亮缎黑翅帽，给大脑袋撑得锃圆，顶尖一颗红玻璃球儿，赛只鲜樱桃，清黑海龙对襟马褂，里头一件湖色青纱青行棉袍，当胸一排疙瘩绊儿，个个盘成大云字花，地道是这一年刚流行的袍褂，着一身衬着肥头大耳细皮嫩肉，活活一个大宅院的大少爷了。[43]

1.3.3 儿童服饰

发式：儿童髡发、垂髫，在头侧、头顶或正中及两侧结纂，头顶结硬短辫（叫朝天杵）。（图5）

日常服饰：儿童日常穿红肚兜，为儿童祈福做百家衣，脚穿老虎鞋、戴手镯、脚镯、长命锁、老虎褡链等饰品。(图6)

《阴阳八卦》也写到儿童服饰："儿子肉球脑袋上扎根朝天杵，脚下套一双老虎鞋，脖子上挂一付叮铃铛啷响的长命白银锁。"[44]

这时候的"洋装"或"番装"对孩子衣帽的影响比其对于大人的影响大。[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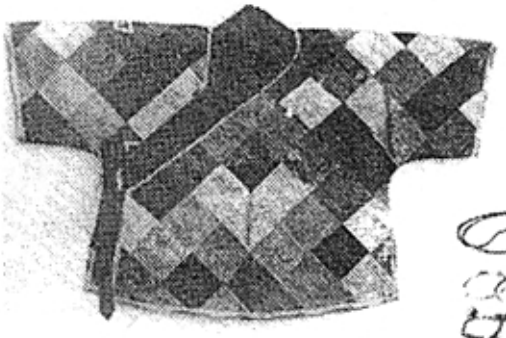
注释：

[1]冯骥才著，《阴阳八卦》，中国曲艺出版社，第2页

[2]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1993年7月第一版，第134页

(图5a)

(图5b)



(图6a)

(图6b)

根据中英《续增条约》第四款:“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条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中法《续增条约》第七款:“从两国大臣画押盖章之日起,直隶省之天津府克日通商,与别口无异。”

[3]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7月第1版, 第295页

[4]《近代天津城市史》, 第294页

[5]《津门杂记》标点本, 第137页, 转引自《近代天津城市史》第294页

[6]冯骥才著,《神鞭》选自《冯骥才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年9月第1版, 第209页

[7]罗澍伟著,《天津近代城市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11页

[8]罗澍伟著,《天津近代城市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11页

[9]《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10]《天津简史》,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143页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给清王朝的统治者以极

大的震动，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李鸿章采用了西方的新式武器，收效很大，由此逐渐观察到中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的巨大差距，开始兴办洋务，成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天津成为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但由于种种原因，洋务运动并没有能够为天津近代工业打下雄厚的基础。"

[11]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

[12，13]王翔著，《清末民国时期的土布和洋布之战》，转引自《民国春秋》，1998年2期总68期，第27页

[14]王翔著，《清末民国时期的土布和洋布之战》，转引自《民国春秋》，1998年2期总68期，第26-29页

[15]《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中国纺织出版社，第291页

"1863年天津进口各色棉布共20万匹，价值白银101万两，占洋货进口总额的16%，1883年，棉布进口量已达296万匹，价值632万两，占进口额的61%，棉纱的进口也逐年增加，另外，我国的棉花和羊毛也通过天津港口大量出口，促成了天津纺织工业的产生和发展。"

[16]《近代天津城市史》，第171页

[17]《津门百咏》，选自

华鼎元辑《梓里联珠集》，张仲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7页

[18]　　选自（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48--150页

"有十六个条约港口设有外国的租界，即专门为外国居民设立的特区，其中地方的行政（警察、卫生、道路、建设管理等等）都由外国人管理，财政收入是外国当局所征收的地方税。例如，天津、汉口和广州的外国人居住区为'租界'。在这些地方，中国政府征用或者买下整个区，然后永久地租给特定的列强（在天津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在汉口租给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在广州租给英国和法国）。租界国的领事常常得到工布局的支持，是每个租界的主要官员，通过他们，外国人个人可以转租到特定的产业。"

[19]（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第255页

"通过治外法权的法律制度，口岸里的外国人被给予相当于士大夫统治阶级本身所有的那种特权地位。例如，传教士和儒生都可以不受县官的笞刑。外国的炮舰不能拒之门外。这样，在华的外国人被吸收到一个新的权利结构之中，缔约列强在多重管理的中国政权之内的某些方面行使主权。"

[20]（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第155页 [21]《天津日租界概况》，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

第１３４页

“日本商品出现于天津市场，较英、美等国为晚。在一九０四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才开始染指于华北市场，不数年就取得优越地位。仅以华北市场主要商品之一的棉纱为例，一八九四年华北三大口岸天津、烟台、青岛进口棉纱总额中，印纱占９２%，英纱占５.５%，日纱仅占1.4%；但到了一九一二年，印纱降为33.8%，英纱降为0.1%，日纱则增加到66.1%。棉布市场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由于日本棉布在华北市场的大量倾销，致使河北省各地生产的土布遭到严重打击，织布工厂纷纷倒闭 勉强维持生产的被迫转向内蒙及西北边陲地区另寻出路，但日商又跟踪向西北倾销，终于将国产土布逼进了绝境。此外，日本向天津倾销的砂糖、纸张、人造丝等，也都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22]杜立昆著，《白俄在天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期，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23]《天津法租界概况》，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二期，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24]王文瑞、周恩玉著，《话说小白楼》，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七十五期《天津租界谈往》，第105 页

[25]吴同宾、张仲、辛公显著，《天津英租界概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九期，第２３－２４页

“戊戌政变的告密者袁世凯在慈禧太后死后，感到形势对已不利，乔装打扮潜来天津，住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今天津饭店）避风，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指令英工部局派专人加以保护，并立即向清廷为之疏通，最后得以平安无事，以‘养疴’为名，返河南彰德洹上村。一九二二年大总统徐世昌被直系军阀赶下台，于六月二日通电下野的当天，就携眷避居天津英租界。一九二三年六月大总统黎元洪为直系军阀所逼跑到天津英租界后，不甘心失败，竟在英租界内陆续发布‘总统指令’和‘总统任命’，企图借外人之庇荫，苟延其政治生命。通过贿选上台的总统曹锟，在下野以后也寓居天津英租界。黎元洪、曹锟、徐世昌后来都死于英租界私宅。”

[26]冯骥才著，《神鞭》，选自《冯骥才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242--243页

[27]谢鹤声、刘嘉琨著，《六十年前的天津估衣街》，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3页

[28]顾道馨著，《试从传统社会心态剖析天津区域文化》，选自《天津文史》1997年6月第19期，第46-48页，天津文史研究所

[29]樊彬著，《津门小令》，选自《梓里联珠集》，

[30]《梓里联珠集》，第111页

[31]顾道馨著，《试从传统社会心态剖析天津区域文化》，选自《天津文史》1997年6月第19期，第46-48页，天津文史研究馆

[32]杨仲绰著，《天津"广帮"略记》，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七期，第43-51页，天津文史研究所

[33]顾道馨著，《试从传统社会心态剖析天津区域文化》，选自《天津文史》1997年6月第19期，天津文史研究所，第46-48页

[34]《梓里联珠集》，第153页

[35]罗澍伟著，《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科出版社，第111页

[36]冯骥才著，选自《冯骥才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207-208页

[37]王社著，《近代天津服饰习俗》，选自《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刊，1988年10月第二期，第84-87页

[38]冯骥才著，《阴阳八卦》，中国曲艺出版社，1989年3月，第148页

[39]《大公报》1935年6月22日星期六11版，合订本126卷，

[40]王社著，《近代天津服饰习俗》，选自《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刊，1988年10月第二期，第84-87页

[41]罗澍伟著，《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科出版社，第111页

[42]冯骥才著，《阴阳八卦》，中国曲艺出版社，1989年3月，第130～131页

[43]冯骥才著，《阴阳八卦》，中国曲艺出版社，1989年3月，第148页

[44]冯骥才著，《阴阳八卦》，中国曲艺出版社，1989年3月，第148页

[45]许地山著，《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女装》，《大公报》1935年6月22日星期六11版，合订本126卷，

2. 民国前后天津地区洋化日深的服饰与解开束缚的着装意识

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之交的天津由于开埠和租界的出现，洋化的趋势是明显的。到了民国建国前后，由于北洋军阀兴办实业、国民革命教化民众使得天津的洋化程度更深，别具特色的天津地域文化——小洋楼文化的形成是其体现，西服业在天津发展到一定规模，穿着者渐增。随着民国的建立，人们的思想意识日益开通，着装意识上的束缚日渐解开，其表现是男子剪辫、女子放足、倡导国货、移风易俗。

2.1 北洋军阀与天津纺织业

开埠前，天津的主要工业是贩粮业、海运业、漕运业，开埠后，随着外国贸易的进行，商业构成发生了变化，新兴的行业是洋布进口和钱庄。[1]北洋军阀是清末民初从天津发展起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病死，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把直隶总督衙门迁到天津，极力把天津建成自己的统治基地，除了不断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外，还千方百计的加强经济实力。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派周学熙去日本考察工商业，认识到由贫转富主要在于"练兵、兴学、制造三事"，特别是"日用所需洋货，几无一非本国所仿造"，因此，袁世凯委任周学熙总办直隶工艺局，主持天津的实业建设。直隶工艺总局创办于1903年9月，下设工艺学堂、实习工厂、考工厂，在直隶工艺总局的倡导下，天津南海出现了一批官助商办的近代企业，如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天津造胰公司、华艺啤酒公司、海北(制盐)公司、万益织呢厂等等，这对天津及附近地区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培养本国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起了一定的作用。直隶工艺总局为倡办实业，先后六次派人去日本考察学堂工厂和商品陈列，学习织布和造纸，回国后，对天津的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影响很大。由于袁世凯的大力提倡，直隶在当时成为全国推行"新政"最活跃的一个省份，袁世凯在天津和直隶兴办的新式矿企业，被称为"北洋实业"。

民国初年至北洋军阀统治结束，以纺织和面粉工业为骨干的天津工业，逐步形成以大机器生产为主，手工工厂为辅的工业生产体系。从天津民族工业的统计表来看，资本额最多的是纺织工业，厂家数最多的也是纺织工业，从行业来看，第一是化学工业，第二就是纺织工业。大战后，从1916年到1922年短短六年时间，陆续建立了机械化程度很高的华新、裕元、恒源、北洋、裕大、宝成六大纺纱厂，资本总额189万元，增加纱锭四十四倍多，[2]而

且机器织布工厂也有了新的巨大增长。天津各棉布厂所用的原料，有人造丝与棉纱两种，1925年前，各厂仅用棉纱和蚕丝，之后，开始用较大宗的人造丝为原料。此外，内部分工越来越细，还开始建立了机器针织业、提花业、毛巾业、地毯业等。棉纺工业逐步向配套生产发展，天津成为全国棉纺织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3]从1912年到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北洋军阀官僚也大量投资近代工业，并且主要集中在投资少、见效快的轻纺等工业，在天津的六大纱厂中，有四家是北洋军阀集资创办，其他两家也与军阀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一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我国脆弱的民族资本赢得了崛起的机会，特别是纺织业的利润吸引了官僚军阀和商业资本的资金，争先投资创建纱厂。[4]中国的针织业是从生产袜子开始，之后逐步生产针织物，[5]发展速度也很快。[6]总之，从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36年天津市最终确立其直辖市的地位和完成市县的划分，天津不仅进一步发挥华北经济中心的作用，而且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个直属中央政府直辖的特大城市。

2.2 洋化日深的天津服饰

2.2.1小洋楼文化与服饰

外国人使天津租界变成真正的国中之国，它的职能当然不仅是划地为生活所需，还要向外渗透自己的力量。租界内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影响到中国人。"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要由中国人居住的条约口岸，是文化共生现象的产物，是西方的扩张与成长的面海中国的力量的结合点。"[7]

租界文化不断向天津人生活中渗透，继而与天津本地文化共生。共生文化的典型代表应为小洋楼文化。"小洋楼文化是天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小洋楼里的天津人，更是昔日天津的一个重要居民社区：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被视为是两个城市最重要的标志。"

所谓的小洋楼，就是天津旧租界里的花园住宅。[8]小洋楼里的第一代居民是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紧随其后，从事洋务的人入住租界，再然后，下野军阀、满清遗老、失势官僚来此"隐居"，富商也掺杂其中。[9]小洋楼文化是本地文化、外来文化和江南文化等多种文化的混合体，是一种外来居民与本地居民的共享文化。[10]"小洋楼文化的根本内容，就是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价值观念。"[11]它给当时的天津人带来了海洋文明的躁动。"小洋楼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健康的和病态的，有益的和有害的，全都混杂在一起，它使你在接受的同时，就失去了抵制的能力。穿西装，吃西餐，看电影，进舞厅，

就在你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同时，你也同时接受了这种文化带给人的躁动。"[12]跳舞、吃西餐、穿西装，享受新派的风光就是小洋楼里的例行公事。[13]

林希在《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一书中写到：

住进租界地，我们的生活即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菊儿姐姐和我上小学，倒也没有什么明显不同的感觉，茵儿姐姐和松哥进了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一进门就得"speak English"，学校里不许说中国话，他们两个完全变成洋学生了。……迁进康宁别墅，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在府佑大街，我们的早点吃煎饼果子，迁到康宁别墅，我们的早点变成了牛奶面包。倒不是追求西方生活方式，是想吃煎饼果子，没有地方去买，一条爱丁堡大街，就是一个面包房，一个牛奶房，你还想过老天津卫的生活，人家不侍候你。穿衣方面，我爷爷自然是不肯变化的了，反正我父亲是脱了长衫马褂，穿上了西服，扎上了领带，足登皮鞋，手提大皮包，完全是一个新派人物了。日常生活上，当然也发生了大变化，早以先我们见了朋友要双手抱拳作揖，现在则要走过去热烈握手；早以先我们见了上一辈的女性叫婶子大娘，现在叫伯母阿姨；早以先我们遇见要祈祷上苍的事，要唤老天爷，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有了什么事，就喊上帝；早以先我们骂人时说"臭王八蛋"，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骂人，只骂他是魔鬼。和平演变，真是全盘西化了。"[14]

由此看来生活在"小洋楼"里的天津人的语言、饮食、服饰、礼仪等方面都被洋化了。天津人的生活极其洋化，以溥仪在天津的生活为一个侧面可以看出：

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象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 [15]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银行等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钻石、把自己装点成《老爷杂志》上的外国贵族模样。我每逢外出，穿着最讲究的英国料子西服，领带上插着钻石别针，袖子是钻石袖扣，手上是钻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着德国蔡司厂出品的眼镜，浑身发着密丝佛陀、古龙香水和樟脑精的混合气味，身边还跟着两条德国猎犬和奇装异服的一妻一妾……[16](图28)

2.2.2 西服在天津

中国人最早制作、穿着西装是从上海开埠后开始的。[17]"1864年上海虹口

百老汇一带，有人摆地摊销售进口呢绒，这为西服的发展创造了物质条件。1880年中国人最早在广州创设信孚成记西服店。1903年王才运又在上海南京路开设荣昌祥西服号。1905年宁波人李来义在苏州开设李顺昌西服号。"[18]这是西服业在中国的肇始。

西服的普及却是与民国发布的服制令有着直接的关系，"辛亥革命后，国内穿西服的人逐渐增多，中华民国将西服列为礼服之一。1919年随着国产缝纫机的问世，我国的服装生产由手工缝制逐步转向机械缝制。当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西服成为新文化的象征，冲击着传统的中式长袍、马褂，中国的西服业得到很快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西服店兴起 。1930年仅上海一地就有大小西服店420余家(大部分都附设工场)，从业人员3000余人。同年，上海成立西服业同业公会。"[19]

(图28b)

(图28a)

西服业的生产绝大部分靠手工制作，1919年国产缝纫机问世后，西服店开始购买使用，代替部分工序的手工。当时的西装制作讲究面料和缝制工艺，[20] 西服业的经营方式多样，主要是亦工亦商，店场合一，产销一体。[21]

西式衬衫在晚清与西服同时传入中国，开始只有少数来华人穿着。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人穿衬衫者逐渐增多。当时，市场上流行的衬衫，大多是美国货或日本人来华制作的，国产衬衫只有西服店内少量附带加工缝制。[22]衬衫业以小型厂居多，一般将产品委托大型百货商店代销。[23]

在天津，民国时期各行各业的商人有明显的帮派之分，其中著名的有闽粤潮帮、宁波帮 、山西帮、山东帮、天津帮、南宫、冀州帮等，其中在宁波帮经营的行业中，西服业占有一席之地。[24]其所经营的服装业原称西服业，天津宁波帮裁缝俗称"红帮裁缝"(因宁波人称西洋人为"红毛人"，为红毛

人做衣服，故称之谓“红帮裁缝”)。[25]

“从事这个行业者，多鄞县南乡人和奉化人，乡谊观念极深，以手艺精良，在天津西服中占有很大优势，先后发展到七、八十家之多，分设于各国租界内。职工人数，最多达到二百五十余人。其中规模较大者，有：复兴祥、张兴茂、马源昌、王珍记、王元记、周立昌、何庆昌、周和昌等家。还有专做铁路局生意者，有孙理长、方锦昌、聚新长三家。……此种行业，向顾主索取工价极昂，发给职工工资又极低为，是极赚钱的手工业。”[26]

天津广帮在极盛时期(光绪中叶到一九三一年)也在天津经营西服裁缝业，商号有广生、广裕兴等 。[27]

从天津档案馆现存的资料看来，天津的西服业有西服、西服手工、汗衫、学服、衬衣等行当，来料加工、批发、零售均有。最早的西服店成立于光绪三十年左右，二十年代中期、三十年代成立的较多。(旧字129-3(二类)-2061)

“早年做西服、军服、制服的一级技师，在小白楼江夏里的何庆昌和法租界的王阿明，都是宁波人。何庆昌做西服手工精细，完全合乎英国绅士派合体大方。当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制服一律由何包做，故而他与工部局关系密切，每当他出门坐包月车上街，英巡捕见他都行礼以表尊敬。”[28]

西服业的裁缝师傅，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对一些关键的工艺技艺，不轻易传授他人。[29]西服店主要分布于各租界内，(旧字129-3(二类)-2061)昔日西服店至今给老人留下较深印象。“在通往东兴大街的路口处，有家西服店，那时的西服店主要是承做加工活，但店主人将店名“夺天巧西服店”用长幅布高高的悬于马路上，这种以广招徕的方法及其夸张的店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0]30年代，天津的大新西服店，是这一时期全国知名的西服店之一 。[31]中国人对西服的穿着礼法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关于西服仁者见仁，林语堂就反对穿西服，[32]清末常有人穿出土不土洋不洋的样子，当众出丑。[33]说到土不土、洋不洋，冯骥才曾写到：

转天大早，玻璃花上出会那天不中不洋的打扮，袍子外边特意套上飞来凤送给他的那件洋马褂，来到广来洋货店。杨殿起见了就笑道：袍子外边怎么还套上西服坎肩？哈哈哈哈，到洋人那儿去，哪能这种打扮，甭说你这套行头不伦不类，就是穿上地道的洋人装，在洋人眼里也是中国人，洋人反而看不上。[34]

民国建国在服制令中规定西洋服饰可作为礼服，西服得到官方肯定。[35]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天津国货售品所印行宋则久著的《西装服饰礼俗考》，上面说“剪发日盛，而洋服各种，必须极力研究，以供买主之购用，惟凡一事必有一事之讲究，若即易洋服，而不得洋服各件用法之当，将为外人所讪笑，刻吾津人士精于此学者尚少，本号既创售此货，自应先将此中底蕴考查尽悉方能对买主发确切之议论，使买主依言而乐购之……”[36]其内容有各种帽、衣服、靴子、领带、手棍名目及用法，剪发之种类，分发留发之办法，西人通俗礼节之参考等 。虽为一本商业用书，但在为西装礼俗正名方面仍能起到作用。

高档西服需定做，一般要几次试衣，低档西服为青年学生所喜欢。到了三四十年代，西服为出席正式场合需备的服装，用它撑门面的也有人在：

最前一辆上坐的正是绮琴，第二辆跨斗车上坐的上一个脑满肠肥的中年男子，身上崭新的纺绸长衫，头戴极细的巴拿马草帽，眼镜戒指，一应俱全。好象在脑门上写明是个发国难财的暴发商人。第三辆车上也是一个中年男子，穿着小大合适的浅灰色漂亮西服，看样子是来自多山少水，多兽少人的地方，当然也是天津人所谓的“老赶”。不过他能追赶时代，用巨富的钱财，作成个时髦的外表，应该称为“画花的老赶”，和市上所谓画花的鸡蛋（这东西已不常见了）一样，自然比不上画花的值钱。他又生了个八楞脑袋，令人感到是什么庙里塑制的小鬼，刚塑完形体，尚未着色上油，就感受了日精月华跑了出来，到天津作囤积倒把生意，大发横财。成了富翁以后，穿上西服，坐上包车，那八楞脑袋，就得尊称为头角峥嵘了。[37]

民国早期被全国包括天津城市居民采用的西式服装样式有：

大礼服　民国初年流行的正式社交礼服。燕尾服，民国初年流行的男士晚间正式礼服。黑色。其外套后背衣摆造型类似燕尾，故得名。领型为尖角驳领，下领片饰以缎面料子，长裤的边缝线嵌有缎面条饰。常配有白衬衫、白背心、黑领结、白手套及黑色高筒礼帽和黑色漆皮皮鞋。

西装　民国时期大城市中男子的半正式礼服。翻驳领，有垫肩，左胸有开袋，衣身左右各开袋一只，钮扣有单排或双排，一般为一粒或两粒钮。风格挺帅有结构感，与背心、西裤相配成三件套西装。面料以毛呢为主，服色为黑色、深蓝色和白色居多。

大衣　穿于袍服外的西式外衣，特征为有领、袖、开襟，衣长过臀。衬衫，有领子、袖子和前开襟的上衣。通常胸前有贴袋，袖口有克夫。

西式长裤　裤身由四片构成（裤腰合体），其裁剪原理源自西方，多用毛及棉织布制成。

毛衣　亦称绒线衫。有手工编结和机械编结之分。[38]

2.3 解开束缚的国民着装意识

2.3.1 国民革命与服饰教化

1911年中华民国建国，仿效西方的民主政体，因而在法令制度上，无不体现民主与开放，服制令也不例外。服制令规定，西服与中式服装同为礼服。[39]天津洋化是民国服制令在天津顺利颁行的土壤。民国建国在衣着上的影响：在男子是剪辫，在女子则是放足。男子剪辫并不象清朝开国，用血腥的手段执行，但仍然有强制，剪辫也成为民国进行民众教化的手段：

这时候，大清朝亡了，外边忽然闹起剪辫子，这势头来得极猛，就象当年清军入关，非得留辫子一样。不等傻二摸清其中虚实，一天，胖胖的赵小辫儿抱着脑袋跑进来。进门松开手，后脑袋的头发竟象鸡毛掸子那样乍开来。原来他在城门口叫一帮大兵按在地上，把他辫子剪去了。[40]

民国行的是文明礼法，文明(时髦)戏等文明时尚在天津兴起得很早，话剧在近代城市中出现，是天津开风气之先的。1909年(宣统元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自编自导自演了天津舞台上第一出话剧《用非所学》，自此，以南开中学等地为阵营，话剧流行于天津。同时，京梆时装戏盛行，紧接着，文明戏出现。

二十世纪初期，天津的报纸杂志由以前的数种猛增到五六十种，其中主要有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大公报》和《北洋官报》，1905年创刊的《天津商报》等，天津逐渐发展成华北地区新闻事业的中心，很多报纸杂志在副刊等位置刊登了与服饰有关的内容。(见 3.1.1海上的影响)

2.3.2 放足

其次是女子放足。最早的放足令产生于1902年，民国前后缠与放之争最为激烈。

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从五代到清末，女人裹脚的历史有一千年了，虽然大清入关时，一道禁令，旗人不准裹脚，还要汉人放足，最后汉人照裹不误，并将小脚形容成莲瓣莲勾、三寸金莲、四寸银莲。当时有句谚语："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当时的绣鞋也有很多讲究，有北式，津式，京式，晋鞋，蝴蝶鞋，杭州鞋，古式扬州鞋等等。[41]各地又略有不同，如"广东女子缠足以如马蹄为荣，每

行路需二人搀扶;山东女缠足真不满三寸,行路需人背负."[42]更有甚者,大同有晾脚会:

大同,每逢四月初八,必办赛脚大会,倾城出动,极是壮美。没想到京畿之间(指天津),也有赛脚雅事。

……

赛脚会,也叫晾脚会。……鄙乡大同,古称云中。有句老话说"浑河毓秀,代产娇娃"。我们那儿女子,不但皮白肤嫩,尤重纤足。每逢四月八日那天,满城女子都翘着小脚,坐在自家门前,供游人赏玩。往往穷家女子小脚被众人看中,身价就一下提上去百倍

……

各式各样自不必说,顶奇、顶妙、顶美、顶丑、顶怪的,都能见到。……晾脚会规矩可大——只许看,不许摸。摸了就拿布袋子罩住脑袋大伙打,打死白打![43]

缠足显示了上流社会领导下的统一性,这种习俗开始隋唐五代,得到宋理学家的支持,并在明清两代遍及农民,先是作为上流社会男子变态性满足的恋物,接着成为城市富足的夸耀,并普及乡村,从而严重损害了半数农民的劳动能力。[44]千百年来,人们对缠足这一畸形现象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发出异议,男人们更是以莲癖而自命风雅.[45] 直到戊戌变法,康有为劝禁缠足之请,仍被廷臣所阻.1894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反对缠足的团体[46],经过几次请愿,1901年12月,光绪皇帝才颁布一道上谕:"由来已久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上造物之和,嗣后缙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47]光绪三十二年,公益天足社孟扬等上书:

呜呼,我中国妇女何不幸而竟遭一番折骨断筋之浩劫哉……欣逢我皇太后皇上恩德鸿施下诏,劝戒千年沉疴,逐渐革除复蠲……[48]

1905年北洋高等女学堂创办,该校《试办章程》中提出:体操可治女子荏弱固习,应为必修课 入学资格虽然不拘天足,但应加以提倡。[49]清末天津近代教育家、南开教育的奠基人严范孙对女子教育尤为重视,他在当时反对缠足,主张妇女接受新思潮,曾编写了一首《放足歌》:

五龄女子吞声苦,哭向窗前问慈母。
母亲爱儿自孩提,如何缚儿如缚鸡。

儿足骨折儿心碎，昼不能行夜不寐。
邻家有女已放足，走向学堂去读书。

少小学生向母提，儿后不娶缠足妻。
先生昨日向儿道，缠足女子何太愚。
书不能读字不识，困守闺门难动移。
母亲爱儿自孩提，莫给儿娶缠足妻。[50]

民国建立之初，就立令放足。由于强令推行，加之新思潮的影响，各种关于放足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大中时报》(1936/7/4日)报道称：

民国刻下二十岁以下三十岁以上天足尚在半数，二十岁以下天足女子在大城市亦算普通，虽未在学堂读书者，已不缠足。此系民国改良一大关键。

2.3.3 婚俗

共和之初，新事物层出不穷，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洋楼文化固然有其鲜明的西化特点，而新思潮、新观念对民间亦渗透很深，体现在民俗上，最明显、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婚俗了。民间婚俗有很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点，规矩礼仪，承传有自。津俗婚嫁不拘六礼，但以通媒为定，男家备簪饰数事为定礼，娶前一日，女家舁送妆奁。[51]传统习俗讲究纳征，既婚娶前二三日，"具簪钏衣裙，鹅鸭果饼之属，送往女家，谓之催妆礼"，[52]也叫过礼，换帖，《旧天津的婚礼习俗》里谈到女子出嫁的嫁妆有衣裳首饰陈设品及日用品等，所有的东西都尽可能凑成双数，其中说到过礼的"簪钏衣裙"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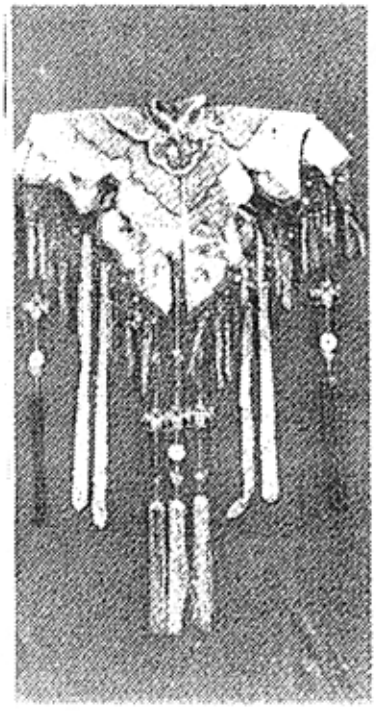
衣裳。衣裳无额，凡单夹皮棉纱，绸缎绫罗呢纱布样样皆有。内衣以同质同色的为一套，外衣以大袄、裙子、氅衣为一套。大袄颜色要鲜艳，以大红和紫色居多；氅衣皆天青色；裙子惯用大红色。皮衣种类较多，如羊皮、寒羊皮、羊皮、狐皮、灰鼠皮、银鼠皮、猞猁皮，貂皮皆有。各类衣裳都要叠成方形，用红线绷好放进箱子。如箱子装不下，可摆在条盒里单送。

被褥。被褥备四套或八套，每套有枕头一对，不装东西，但每个角上钉有整串的栗子、枣及荔枝、桂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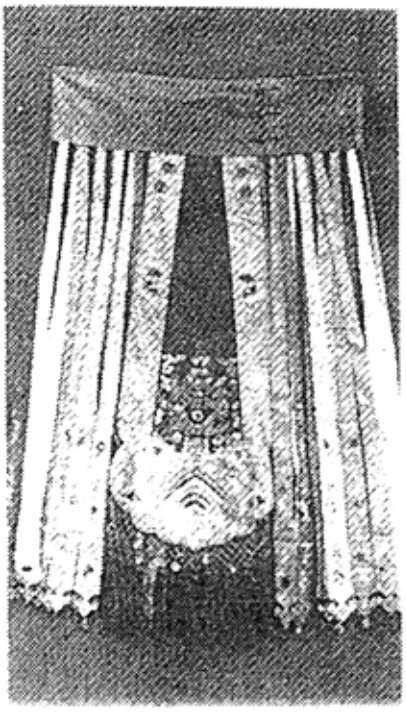
首饰。数量不限，真金、点翠、镶珠宝等均可，但不准用白银。首饰一律绷在大红托上，名叫绷盘子。送时用条盒装。[53]

如今，虽依然还要保持原来的民风，但毕竟是共和国了，新思潮也冲击着天津的人们。《丙寅天津竹枝词》是一部以叙事诗体裁记载天津地方风土人情、遗闻琐事的著作，此书成于民国丙寅年（1926年），以竹枝词体生动地记录了民国初年青年人谈情说爱，结婚礼俗上的变化。[54]"倩影喁喁话柳阴，灯照不觉日光沉，别时密订来朝期，庙假中街起士林"。青年人受西方思潮的影响，引进西方谈恋爱的方式，挽着胳膊遛马路或上起士林去吃冰激凌。"指环互换馆同心，不用交杯酒再斟，宾致贺词主谢，堂前应节奏风琴"，在结婚仪式上，取消了旧式拜堂坐帐喝交杯酒，吃子孙扁食的礼俗，代之而起的是唱歌、跳舞。

结婚礼服与习俗密切相关，具有深厚的民俗色彩。各个不同时期习俗各



（图7）



（图8）

不相同：清中后期，婚礼服装为花衫子，响铃裙，头戴凤冠。花衫子类似古代的云肩，披在红稠花袄上面；响铃裙是罩在丝绸红裙外面的礼服裙。腰以下排列以剑状飘带，飘带末端系以金银响铃，走起路来，有轻微响声，其制作精美，鲜艳华丽。此礼服"乃津俗特有，上披'花衫'(图7)，云肩披风，飘

（图9）

带络索，系‘响铃裙’(图8)，榴红飘锈，裙角缀小金铃百余。每姗姗小步，便听泠泠作响。拜堂之际，共新郎跪拜，俯仰之间，环佩铮然，别有一种风度。头上云髻金钳，珠花压发谓之‘披挑’云，盖新人而著‘花衫响铃裙’，非缙绅之家不办”。[55]此裙自兴起后，北京及外地妇女平时和喜庆节日皆可穿，天津则只限于婚礼中穿用。民国以后，受西方文化影响，天津人时兴文明结婚，婚礼仪式中西结合。结婚时的服饰有很大变化，如婚礼服换成了拖地长裙，结婚时披婚纱，戴婚戒，成为一时时尚，（图9）当时的报纸、杂志中经常谈到这一时尚，（如《天津大中时报》1936/7/1《新式结婚之指环》，兴致盎然地谈论着戒指应该戴在哪个手指的问题；《国闻周报》1935年三十七期第28页《婚俗趣谈》里谈到结婚为什么要用戒指，衣服为什么要用白色，新娘为什么要幕面，手套与婚礼等等）；红盖头也改成了蒙头纱，长可拖地[56]。关于婚俗和新娘的妆饰打扮，《新天津画报》中的《花衫响铃》中谈得最为具体：

现时婚礼，新嫁娘当披面纱，衣旗袍高跟鞋，御指环捧鲜花，由伴娘扶绰，徐登汽车，驶到礼堂，致辞奏乐：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交换戒指，钤印章于戒指上，而大礼成。旧式结婚，繁文缛节，非世家不能道，亦且随地易俗，仪式不必一致也。[57]

而男子则穿西服，打领带：

今天他穿了一套西装，系着一条红领带，头发梳得油油光光，看着比平时年轻多了。看着侯渝之得意的样子，又看见花汽车在乐队的引导下缓缓地向着饭店开了过来，再看见饭店门外人山人海地把侯渝之围在当中的热闹劲儿，那时侯，我心里就想，将来到了我娶媳妇儿的时候，也一定要有这等的

排场。[58]

婚俗的内容也有了新的变化，如：

跟在新娘子的身后，几乎和她并着肩地走进了饭店。饭店里灯火辉煌，楼上的大堂，布置成了礼堂，侯渝之和范家大小姐并户丫好，这时唱礼的人又唱了起来："向国父遗像三鞠躬"。把中国人传统的拜天地，改成了拜国父，就算是维新了。然后，向双方家长三鞠躬，……然后，"新郎新娘相向立，……"就是让他们两个人对面站好，"三鞠躬。"这时候，所有的客人一起跟着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喊一声，叫一声好，鞠完三个大躬，大家再一齐喊好，声音震耳欲聋，比后来喊万岁的劲头还大。[59]

所有这些婚俗的变化都说明时代变化对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改变，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一定程度的认同，传统与西洋文化并行不悖，移风易俗的程度虽然不彻底，却悄然起着微妙的变化。

2.4 国货与华服

2.4.1 国货

天津的近代民族工业一直非常薄弱，随着中外商人交易日益频繁，外国商人欺行霸市，抢夺市场的劣行，激起了民族商业资本家的不满，申请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华商组织，光绪二十九年"天津商务局"成立，后改名为"天津商务总会"。天津商务总会的成立，说明天津的商业资本家在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开始挣脱对洋商的依附地位，要求独立发展。

二十世纪初，美国发生经济危机，为了转移后果，资本家开始煽动排华，禁止华工入境，后来竟然发展到武装围剿华侨，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掀起了气势磅礴的反美爱国运动，抵制美货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60]在全国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洋货的高潮。1905年5月上海成立了抵制美货协会，上海商务总会向各地商会发出电文，要求协助，天津积极响应，并在商界学界召开大会指定攻守同盟，但最终由于袁世凯的压制（害怕酿成西方列强的大规模干涉）和天津商会的妥协而未能发展起来。[61]

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积极提倡实业，袁世凯执政期间先后指定和颁布了有关振兴实业的章程和条例，天津首先响应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扶植

民族工业。为了外唤起国人兴办实业的兴趣，于1915年8月举办了国货陈列会，1919年举办直隶省手工业品展览会，1922年举办直隶省第一次工业观摩会，还积极推荐各个企业参加全国和上海等地举办的商品展览会，以及新加坡、南洋举办的展览会。1925年全国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上，天津获奖厂家达到135家。

天津商会以"维持国货为当前之急务"，鼓动各界人士创办实业，并为提高国货的质量于1916年10月1日--30日开办了国货展览会，互相观摩，以求竞进之技。在商会的提倡下，各种实业团体纷纷出现，这些实业团体都以"振兴实业""富强国家"为宗旨，他们还发行了天津实业储金券，爱国筹赠券等，以筹集资金，投资于民族工业[62]。直隶工艺总局劝请织染缝纫公司的章程里体现得最为充分

面谕筹设织染缝纫公司以兴实业而挽利权等，……当此风气初开，深恐群情观望，局拟先筹股本一万五千元以为倡。……何道炳莹（即何炳莹）深念织染为民生至计，亟愿勉立筹款，赞成斯举。[63]

抵制美货虽然失败了，但激发起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知识分子，学生，工商界等人士宣传爱国，提倡使用国货，并且，以此为契机，开始生产销售标有"爱国"字样的商品，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国民意识，其中以宋则久和他的爱国布影响最大。

宋则久先生是民国初年天津市爱国实业家之一。1867年生于天津，他16岁到义德泰绸缎庄学徒，后因工作勤奋、踏实，被天津著名的敦庆隆绸缎庄聘请为经理。由于接受"实业救国"新思想，提出"救国必救穷，救穷必先提倡实业，提倡实业必先维持国货。"又提出"国富就是民富，国强就是民强"。宋则久在《天津宋君寿恒（则久）上凌太守救治市面条陈》中例举了天津市面危机的七条原因，指出当时进口不均衡，列强有组织的经济掠夺，并认识到外商和中商之间争夺国内市场的严重性，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抢救天津市面的具体措施，他着手开发的爱国布为"蟹青色二蓝灰色充绵缎爱国布袍面"的袍料，其后经过多次改良，以拥有能与外国机织布匹敌的质量为最大特点，因为采用机制棉纱，引进自动脚踏机，改良染织技术。1910年起的十年间，爱国布成了天津纺织业发展的动力。[64]

1912年宋则久在天津成立了直隶国货维持会，邀请顾琅任会长，自己任副会长。会员发展到3000多人。宋则久先生为实现他推销国货的夙愿，1913年辞去敦庆隆绸缎庄经理职务，花了2万银元买下当时官办的天津工业售品总所，改名国货售品所，该售品所地点就在现时的北马路（原祥德斋门市部，

现已不存)。国货售品所的开办，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人们出于爱国之心，也出于该所物品货真价实，愿到售品所购物。那时的竞存小学全校男生制服及制服帽都到国货售品所订购，还有不少学校学生制服也在该所订货。20年代末，天津宋[illegible]卿招募股份，成立东亚毛纺厂，生产抵羊牌毛线。起初，产品质量不太稳定，但国货售品所大力推销，介绍织毛衣花样，代织毛衣裤，并督促厂方提高质量。随着抵羊牌毛线质量的改善，销路也逐渐打开，为国产毛线推广、应用、销售发挥了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华北。天津的汉奸走狗成立了便衣队，经常骚扰商业、企业。宋则久无奈把国货售品所先迁到旧法租界(现哈尔滨道山东路)。由于地点偏僻，又迁到现辽宁路艺林阁一带，门面数间，一、二楼售货。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了，国货售品所被迫更名为"中华百货售品所"，货源还是国货。一些市民宁可多走路，也到国货售品所买货，不买东洋货。抗战胜利后，美货又倾销天津市场，中华百货售品所还是推销国货。[65]

2.4.2 华服

天津的服装行业种类有估衣、寿衣、估寿衣、新估衣、新衣、成衣、成衣华服、华服等，(天津市档案馆 旧字129—3(二类)—2057 衣业卡片)其中，华服并不是泛指所有中式服装，而是指度身定做中式衣服，七七事变之前，定做华服要比定做西服昂贵，大都做毛料、绸缎和皮货。(依顾道馨先生说)

2.4.3 中山装起源新说

中山装的起源一向众说纷纭，比较主要的说法是由日本的学生装变来、由日本陆军制服变来或由南洋华侨"企领文装"变来。[66]总之，是由亚洲近代服装演变而来。笔者最近在《北洋画报》上读到一则小文，似乎是关于中山装起源的一种新说法：

昨晤自南来某要人，为述民党制服之起源，始恍然于所谓代表三民五权等说，均属牵强误会，某之言曰："昔先总理在粤就大元帅职后，一日，拟检阅军队，欲服元帅装，则嫌其过于隆重不适于时，西服亦无当意者，正检阅行箧中，得旧日在大不列颠时所御猎服，颇觉其适宜，于是服之出，其后百官乃仿而制之，称之曰中山装，至今式样已略有变更，非复先总理初时所服

者也”云云。某君随侍中山多年，其说当不虚也。[67]

（图10）

由图看来，这种说法确有几分可信，英国猎装(SAFARI JACKET)(图10)是英国殖民时期盛行的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服装，常可用于非洲打猎，上下的四个口袋用来装子弹。不过最后成型的中山装与英国猎装相差远矣。

无论这种说法确实与否，综合分析与之并行的几种说法，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中山装无论是创制之初还是普及之后，其主要用途是在军事、政治等严肃场合，其与猎装的功能相似，与戎装所传达的信息相似，而与学生装的服用背景相差较远，因此，军装、猎装说可能更近于真实。学生装大概是在中山装的东方化方面起了一定参考作用。

2.5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前后的天津服饰

2.5.1 女子服饰

发式：民国建国前后女子发式的变化不大。女子梳同样的髻，年轻妇人留一字刘海，中年妇人不留刘海。清末，当日本留学生最多的时候，“日本头”或“大和髻”为一般时髦妇女所喜。

（图11）

日常装：清末民初，汉女仿穿旗袍，并不断改进，终成近代中国妇女最有代表性的服装。天津作为我国北方一大城市，在旗袍变化问题是得风气之先，发挥推波助澜作用的。旗袍最初只有满族妇女所著，特点是宽大、平直、衣身长至足面。衣料多用绸缎，全绣花纹，同时镶滚宽阔的花边。穿联裙衫子的也有。(图11)

（图12）

袄裙（上衣下裙）的穿着方式仍是主流。天津女子的袄较合体，身长刚过腰，袖子下宽上窄，

袖长及小臂中下部。矮领。(图12)

袄裤(上衣下裤)是民国建国后一种新式装束，裤长仅及小腿中部，下穿白色针织长袜，不露腿。(图13)裤基本为较宽的直筒。少女穿的尤多。

留日学生介绍进来的衣衫是窄而长，裙也不用绣文，且以黑为尚。普通的装饰品，在时装以外，加上一对有色眼镜。椭圆的小蓝眼镜是最时髦的。脚下必得穿一双尖皮鞋，两手必有皮包和绢伞。[68]

(图13)

到民国以后，欧美女留学生多起来，从前日本女留学生所提倡的"文明生活"，所谓不涂脂抹粉，不穿耳裹足，等等，都渐被忘记。妇女服装欧化。[69]

饰品：手绢、扇子为主要饰品。

2.5.2 男子服饰

辛亥革命后，服饰的形制有了改变，虽然已有穿西服及中山装者，但仍以穿长袍马褂者为多，有的在长袍外加穿短马甲，有的单着长袍。

民国初年，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开始穿西装，但原来的长袍、马褂仍用作礼服，与西装革履并行不悖。当时穿西装的大多为年青人，其中以学生、教师，公司洋行和各机关的办事员为主。老年人，商店中的店伙以及一般市民则仍着长袍马褂。而平时家居，或在店铺营生则不穿马褂，只穿长袍。至于普通的劳动人民则主要以"短打"为主，便于操作。由于是清末新政的主要推行地，天津男子剪辫较早。

民国建立以后，服装上的禁例基本取消，衣着的奢与简主要取决于经济地位。

2.5.3 儿童服饰

婴儿服饰变化不大，少年常穿洋装，如男孩子的小西装，女孩子的小连衣裙。(图14)

(图14)

注释：

[1]林原文子著，许慈惠译，《清

末天津工商业者的觉醒及夺回国内洋布市场的斗争》,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102--103页

[2]《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3]宋美云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135--143页

"从1912年到1924年的是十三年间,天津连续开设了十三家纱厂,大多数由过去使用木机改成了从日本引进的自动脚踏式织布机和本市仿制的人力铁轮木机,有的工厂还使用电力平面提花机,布匹主要销往本埠、东北、西北各省,甚至少量销往上海、汉口等地。"

[4]《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中国纺织出版社,第291--294页

"天津近代的染整工业始于1929年曹典环开设的华伦机器染织厂生意非常旺盛,不久,福元、北大、博明等厂相继创立,产品销往北平,陕西;毛纺织业始于1898年,吴懋鼎创办天津织绒局,资本25万两,生产军毯,军呢1900年义和团事件被毁,1923年英商海京洋行创办毛纺厂,1935年更名为海同毛纺厂。1931年仁立毛纺厂,1932年东亚毛呢厂在天津建成;天津还是我国近代地毯制造中心,据1929年统计,地毯厂家达到303家,产品精致,主要输往美国、日本、英国、香港等地。"

[5]《社会月刊》3、4号合刊《天津之针织业》

天津的针织业"萌芽于宣统二年,盛于民国十二年,至民国十七年,则突破旧记录为空前之进步,厂数之多至七十八家,几能与提花工业并驾齐驱,亦云盛矣……民国之初,国人习尚布袜,宣统二年始有上海线袜上市,唯彼时女子习尚缠足,以瘦薄为美观,布袜质坚,最适缠束之用,而线袜则伸缩自由,自在摈弃之列。

袜子样式随时尚及人民需要而转移,当初流行时,俗尚扎腿,故袜样均为短统,而且仅有男袜,颜色亦不完备。民国八年,始制女袜、童袜、毛套、套帽,贸易亦于是时产生,然尚无应用麻丝者。民国十二年,衣饰变异,扎腿者渐少,袜样乃改为长统。民国十五年,哈尔滨吸收丝袜,本市亦竞为丝袜,然纯丝价值昂贵,非素丰之家不办"。

[6]《中国近代纺织史》上卷,第157--158页

"1912年英洋行高价出售针织机,1913年,王济中创设福益公司,分女子和男子针织两部,同时又到日本考察,以改良国内针织业。相继而起的还有郭有恒、义生、崇华、矩华顺。1918年王氏从日本购得自动机,组织天津针织公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市场上德国袜子锐减,国内袜子产量迅速增长,20年代中期以后,袜子的花色品种渐渐增多,而且袜子兼有棉的柔软和麻的爽滑,不起毛,透气性好,耐穿,深受消费者的欢迎。为

使产品畅销，还采用商标、广告、装潢等手段，以提高商品信誉，这些名牌袜子还远销南洋、东南亚等地。”

[7](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第25－26页

“1842年以后，这个混杂的中国在新商业城市中中国主要水道运输的商业中心发展起来。上海和其他的条约口岸，使人想起以前中国商人成功地在那里立足的槟榔屿、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尼拉及其他欧洲的货物集散地。西方海军－政治力量向中国沿海的延伸，形成了培育现代型中国贸易和企业的摇篮。所有这些口岸，都是中国人在其中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事的国际商业发展的中心。”

[8]林希著，《心系天津小洋楼》，选自《天津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70-174页

“天津的洋式建筑，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势力的侵入，洋人开始在天津营造他们的新殖民地，于是外国势力侵入，洋人开始为自己建筑房屋了。最先出现的洋式建筑，是英租界的领地洋行大楼，随之又出现了法租界的望海楼教堂。后来天津闹教案，起事的民众烧国望海楼。清政府无能，除了在原来望海楼的旧址又建起了新的望海楼之外，还镇压了起事的天津民众：这样，新望海楼比旧望海楼还要高出10米，直到今天也还是天津的一个景点。随着外国资本的日渐入侵，洋人更是在天津建起了银行、洋行，还有许多洋式的大饭店，这其中有著名的戈登堂，有利顺德大饭店，以及曾做过德国领事馆的德国俱乐部，还有后来的开滦大楼，以及惠中饭店、渤海大楼等等等等。至此，天津已经成了一上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了。

就是在洋人们建筑高楼大厦的时候，他也忙着建筑花园住宅，这些花园住宅后来就被称为是小洋楼了，这些小洋楼主要分布在海河两岸，其中以英租界、意租界、德租界、法租界为最有特点。

……天津最有名的小洋楼，也有一些是后来下野的军阀们建起来的。”

[9]林希著，《心系天津小洋楼》，选自《天津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70-174页

“小洋楼里的第一代居民，自然界全都是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他们不是侨民，他们是殖民地开发者，他们要在中国营造自己的乐园。没过多少时间，中国吃洋饭的人家，也开始到租界地来，按照洋人的样子，为自己建筑小洋楼了，这些人全都是仰洋人鼻息、欺压国人假洋鬼子。再到后来，一些下野的军阀，为了寻求外国保护，也在租界地置房产，来这里过起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日子。于是，一天一天，就这样在天津形成了一个小洋楼社区，这个社区的主要成员，大多是仰仗西方势力和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当然

其中也有一此天津人。”

[10]林希著,《心系天津小洋楼》,选自《天津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70-174页

“所谓的小洋楼文化,从渊源上说,还是外来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变异,真正的天津味儿,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尽管最初的小洋楼社区里没有多少真正的天津人,但是天津人却和小洋楼文化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因为光是外国人,光是外来户,他们是不可能独享一种文化的。小洋楼既然创造了一种文化,它就必须地人来共享这种文化。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吧,就是小洋楼社区内既然有了开心好玩的地方,他就得吸引本地的爷们儿来这里花钱,这就是共享文化。……来老租界地分享小洋楼文化的人,自然全都是天津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们。”

[11,12]林希著,《心系天津小洋楼》,选自《天津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70-174页

[13]林希著,《心系天津小洋楼》,选自《天津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170-174页

“最普遍的文化,也就是跳舞了吧。”

[4]林希著,《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210页

[15]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页

[16]爱新觉罗·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2年版,第256页

[17]《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上海开埠后,随着洋人来华日益增多,上海的一些中式裁缝为了兜揽生意,有的登上外轮为水手们缝补衣服;有的在洋人聚居的虹口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一带设摊,为洋人修补衣服。从此,一些中式裁缝渐渐学会缝补并制作西服。于是一部分中式服装的裁缝改做西式服装。”

[18]《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19]《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20]《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西服结构的主要特征是立体型,拼装式,是根据人体的自然曲线,将衣

片裁成多片，然后拼合缝制成衣，给人以立体感，丰满感。西服的缝制工艺精细严格，根据人的不同体型，衣料的不同质地，对弧线等曲线部位，运用热熨斗‘推’‘归’‘拔’的工艺，加温定型。西服的胸部用黑炭衬、马尾衬以手工扎驳，俗称‘扎驳头’和‘扎胸衬’，以增加胸部、领部的弹性和挺括程度。”

[21]《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在西服业出现之前多为拎包裁缝，包内放着面料样品及布尺、笔等工具，到一些达官贵人和富商家兜揽生意，把接到的衣料带回家中裁制，做后送衣上门，颇受用户欢迎。还有个体裁缝，在马路边和弄堂口设摊，专门承接来料加工。这些人中，以后部分发展成为商店户。大型店备有面料，顾客可选料定制，也备有成衣供应。这类店资金雄厚，备料充足，铺面装潢考究，约占西服业总户数的3%。中型店也备有面料，也承接来料加工，有的还接受布料服装的加工。这类店约占总户数的15%。小型店主要是代客来料加工，少量代料定制，并接受布类服装的来料加工，这类店约占82%。

上海是最早形成西服业的城市，1933年从日本归来的顾天云先生，在上海编著《西服裁剪指南》一书。1948年有西服业同业公会集资，创办西服业初级工艺职业学校，由顾天云任校长。此是服装业创办的第一所职业学校，为我国西服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22]《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1912年浙江奉化人邬绥兆、陈斌堂等，合伙在上海四川路560号创设邬复昶内衣厂，购置缝纫机3台，专为外侨加工衬衫。1920年浙江定海人水莲祥，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水美大衬衫商店，前点后工场，承接来料加工和定制业务。30年代初，全国制作衬衫的服装用品厂共有141家，其中90家设在上海。1933年川沙县东沟镇人傅良骏与李光炽、俞景琳3人，集资银元1500元，购得‘胜家’缝纫机3台，在吕班路（今重庆路）26弄错12号开设新光标准内衣制造厂，首创标准牌衬衫，后改用新光牌商标生产男式府绸衬衫。当时有职工约10人，缝制工艺简单，两人合作，一缝一烫，是手工业作坊。”

[23]《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24]王秀顺、张高峰著，《天津早期商业中心掠影》，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第114-116页

[25]《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但各地有各自的工艺特色，形成各自的工艺流派。哈尔滨以俄国派为主（又称'罗宋帮'），以款式挺胸，工艺平服著称；大连旅顺以日本派为主（又称'东洋帮'），以做工精细，讲究小件装饰闻名；上海以做工精湛，博采众长而被称做'海派'；天津、广州以柔软舒适见长，称'欧美派'；还有外形教挺，内在质量一般的'犹太派'等。"

[26]张章翔著，《在天津的宁波帮》，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83页

[27]杨仲绰著，《天津广帮略记》，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49-51页

[28]《话说小白楼》，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七十五辑《天津租界地谈往》，第105页

[29]《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学徒拜师学艺，要经过'学三年，帮三年'才能离开师傅。三年学徒期间，除了帮师娘淘米烧饭做家务外，主要靠自学或'偷关子'，才能逐步掌握一些技术要领。"

[30]李鹏年著，《昔日南马路》，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92页

[31]《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32]《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51页

林语堂说"西服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于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他认为穿衣为"遮盖身体"，而西装则把人体形状表现无遗，对身体好的尚有利，对身体不好的，则"叫人触目惊心"，他把领带讥为狗领，"带这领子，冬天妨碍御寒，夏天妨碍通气，而四季都是妨碍思想，令人自由不得"，他认为系领带就有十一层布封在脖颈上，何为十一层布？"外衣领处必是夹的，故两层，再翻领是四层，衬衫此处又翻领又为四，合为八，领带二，又加当中铺垫一层为三，故为十一"。西装背心等也同样是林语堂所反对的。总之，西服是"非人的衣服，非欲讨好女子的人是决不肯穿来受罪的"。但林语堂在美国也着西装，系领带，解释为入乡随俗，怕长衫大褂，招摇过市，触人耳目，在家中着西服，他认为在穿衣方面，东方征服西方是必然的事情。

[33]《民国春秋》1992年第2期，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6页

"一次，袁世凯举行新年招待会，邀请外交使团陆续到来之时，京郊镇守

使沈金鉴着西装进入大厅，可他礼服后面拖落着白衬衫，有人悄悄告诉他衣着不整。沈大为惊疑，经人说明后，就一再说那是仆人的过错。他说自己因为要穿西服，特别起了个早，让仆人携带帽盒和替换衣服出席盛会。他当即把仆人叫来骂了一通，余怒未消，他又向人解释说他原打算把衬衫塞入裤内，尽管那样不大舒服，但仆人说那样不对。"

[34]冯骥才著，《冯骥才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886年9月第一版，第246-247页

[35]袁仄、区伟文著，《历史抉择的服饰——有感于民国初年的服制法令》，选自《饰》1998年第1期，第21页

[36]宋则久著，《西装服制礼俗考》，天津国货售品所印行，1932年11月出版

[37]刘云若著，《粉墨筝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9页

[38]《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第1版，第171-178页

[39]袁仄、区伟文著，《历史抉择的服饰——有感于民国初年的服制法令》，选自《饰》1998年第1期，第21页

[40]冯骥才著，《神鞭》，选自《冯骥才集》，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1986年9月版，第279页

[41]《大中时报》，1936年7月4日

[42]冯骥才著，《三寸金莲》，四川文艺出版社，前言，第18页与75--77页

[43]冯骥才著，《三寸金莲》，四川文艺出版社，第43--53页

[44]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34页

[45]冯骥才著，《三寸金莲》，四川文艺出版社，第43--53页，第63页

"佟大爷，这位就是山西名士吕显卿，自号'爱莲居士'，听说今儿您这赛脚，非来不可 ……七字法呀，灵、瘦、弯、小、软、正、香。……尖非锥，瘦不贫，弯似月，小且灵，软如烟，正则稳，香即醉，……我家几次赛脚，都是亡妻生前主办。这法儿是她琢磨出的。

小脚美丑，全在形态。何谓形态，形和态呗！先说形，后说态。……上等金莲中间又分三种。两脚缠得细长，好比笋尖，我们大同叫'黄瓜条子'，雅号叫'钗头金莲'。两脚缠得底窄背平，好比弯弓，雅号叫'单叶金莲'。两脚缠得头尖且巧，好比菱角，雅号叫'红菱金莲'。"

[46]费正清 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47]《历史档案》1999/2总七十四期

[48]《女界慈航》，天津商报馆印，光绪丙午年夏五月

[49]《直督任上袁世凯天津纪事》，选自《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刊》，第2期，1988年10月，第27页

[50]《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二十五辑，第53页

[51]《津门杂记·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第38页

[52]张鸿来著，《婚礼杂说》，文化学社印行，中华民国十七年二月初版

[53]李然犀著，《旧天津的婚礼习俗》，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七辑，第206页

[54]《冯文洵与〈丙寅天津竹枝词〉》，选自《天津历史博物馆馆刊》，第82页

[55]《新天津画报》，1934年4月8日

[56]张鸿来著，《婚礼杂说》，文化学社印行，中华民国十七年二月初版

"今俗旧婚礼，女子出嫁，则以红帛蒙首，天津谓之盖头袱；新婚礼不用此，而代以蒙头纱，其长曳地，以为装饰。"

[57]张鸿来著，《婚礼杂说》，文化学社印行，中华民国十七年二月初版

[58]林希著，《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147页

[59]林希著，《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146页

[60]《近代天津城市史》，第491、492页

[61]《清末天津工商业的觉醒及夺回国内洋布市场的斗争》，选自《天津文史文史资料选辑》四十一辑第114-117页

[62]《天津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天津人民出版社，第225--227页

[63]《直隶工艺志初编》，工艺总局刊行，1907年

[64]《清末天津工商业的觉醒及夺回国内洋布市场的斗争》，选自《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四十一辑，第118页

[65]张世一著，《天津国货售品所与宋则久》，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40～141页

[66]郭慧娟著，《民初京城旗袍流变小考》，选自北京服装学院学报艺术版《饰》，1999年，总第13期，第27页

[67]妙观著，《中山装之起源》，选自《北洋画报》七卷，第318期，29年5月14日，周二2版

[68]《大公报》1935年6月22日星期六11版，合订本126卷，在广州，光

绪末年至民国初年，以这种装束底女子为"自由女"，因为她们的装束表示着她们的思想和行为。讲的是"文明结婚"，做的是"文明专业"，想的是"文明思想"如"小家庭"，"破除迷信"一类的事情，所以这种装束也名为"文明装"。当时所谓"文明"等于现在叫做"摩登"

[69]《大公报》1935年6月22日星期六11版，合订本126卷，战后的欧洲，男多女不足，妇女们为求配偶，便用了东方的装饰艺术，使她们无论老少媸妍，都成为香而艳的娇娥。这正是中国女留学生充满了欧洲名城的时候，无形中受了她们的引诱，也就打扮起来了。这一来，使妇女们的服装欧化，同时，成为外国货的消费者。

3.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方时尚都会

二、三十年代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经济中心，沽上（天津）在当时与海上（上海）、上京（北京）鼎足而立，各据千秋。天津成为以燕赵文化为基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交互并存的多源文化城市。在时尚方面，天津受到上海、北京两地的影响：女子剪发、旗袍改良是这一时期社会开放的重要表现 服饰上中西交融得毫无斧凿之痕，其独特的美感成为一种经典的审美模式。

3.1 沽上与海上、上京的交感

3.1.1 海上的影响

(图 15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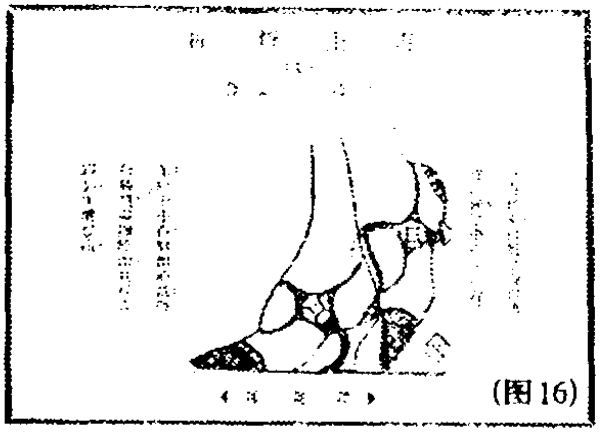
明清两朝天津一度是全国时尚的中心。[1]

"天津为什么那时候时髦？因为天津水陆交通发达，南通江南，北连关外。而且，外通东洋、西洋。那时候，时髦的东西一定要现在天津兴起来，然后才会传到北京。有时候北京不接受，那就只在天津一处地方时髦。到了清末，一些追求时髦的皇室成员，开始迁居天津，为什么？就为了到天津可以享受现代文明，过时髦生活。"[2]

近代天津人也曾学过"京装"、"苏式"，但通商口岸设立后天津人就主要向上海人学时髦了。[3]到了近代，因天津较上海晚开埠十八年，在时尚方面就屈居其后。[4]

(图 15b)

通过上海电影学习上海的时尚是一种重要途径。"天津人开始向上海人学时髦，那是从本世纪２０年代开始的。这时候无声电影兴起，天津人从无声电影里看到时髦的上海滩。到了３０年代，有声电影大繁荣，大量在上海拍摄的电影进入天津，这才使天津人真正了解大上海的时髦社会和时髦人生。于是从此开始，天津人向上海人赶时髦了。"[5]三十年代，在天津前门香烟卖不过上海的美丽牌，美丽牌香烟上的美女月份牌是其畅销的原因，美丽牌香烟雄据天津，天津女性通过向上海时髦女郎学习时髦。[6](图15)


(图16)

"在跟着学时髦方面，天津人应该说中国北方最积极的一个。天津人的时髦，其实就是赶上海。从吃喝穿戴，到待人接物，有身份的人是以'和上海人一样'为荣的。赶不上上海，就是"老侉"，就没见过世面。"[7]

当时包括天津在内的北方地区，在时尚方面唯上海马首是瞻，几乎为人所共识，在报章上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文字："三五月来的上海妇女，一个个都喜欢落发，几乎占上海妇女十分三四，这种情形在内地虽然还不多见，但三年五载之后，说不定也就和如今的上海一样了。"[8]当然向上海学的不会仅仅是剪发。在有休闲类内容的报刊中，许多会报道上海最新流行的时尚。在现在可见的民国时期天津地区报刊中，《国闻周报》对上海流行信息的发布明显较多。

二十年代中期，《国闻周报》"海上新装"栏目每期介绍上海最新服饰与装饰，内容涉及新一季的衣服、首饰、发型、鞋帽等，有图，取以雅名、配以小诗或韵文。(图16)以衣服为例，有旗衫、绣纱衫、联裙衫、风凉衫、百褶装、彩纱衫等名目；还有衣服装饰，如丝穗边、牙月边；首饰有珍珠环、玳瑁钗、单环、纸环等；发型有双结辫、扇子头等……每辑文字虽短，但却能从面料、色泽、配搭、美感等方面一一道来。作者写来极有兴致，这大概也是应观者之求吧。[9]另有连载的《时装小志》，文字较"海上新装"具体，形象介绍上海流行的发型、鞋、披风、围巾。一一归类，描述形状、做法。[10]

当然天津人也不会对上海亦步亦趋，毕竟两地风俗文化有很大差别，天津人对上海的流行趋势并不是没有臧否。时常于《国闻周报》撰写服饰类文章的镌冰女士评到，"上海的繁华都市简直时时刻刻都有新花样，在内地的女子辗转的学习了上海的装束，可是等到学像，上海又早变了新花样了。……不过就我观察上海女子的装束总觉得有时候不免有些流腔。虽然大家风靡一时，可是总觉得有些不登大雅之堂，因为上海的新装的发明者打扮都是娼妓一流人物，伊们创造了出来，于是大家都去模仿，模仿者也只知道趋时好看，并不曾顾到装束与个人的地位有关，因此便造了一种上海式的时装。"[11]如津门文化名人林希所说，"一个地方民众不能形成自己的审美情趣，在生活中不能形成独具个性的自我表现方式，也是有些可悲的。但天津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活法：时髦赶了多少年，在赶时髦中，才形成了自己固有的审美心理，也才有了独特生存形态。其实，赶时髦又何尝不是一种时髦呢？"[12]

3.1.2 上京

虽然天津较北京在政体上时髦,但因为北京毕竟一度是全国政治经济的中心,是政令所出的地方,因而其影响还在,而且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北京的政治氛围不再同于以往,所以,在二十、三十年代北京对天津的影响也是存在的。

《大公报》关于北平古今时装表演的报道[13]、化装跳舞会的报道[14]、化装溜冰会的报道[15],以上会事多为著名交际家主办,名媛、交际花、舞女、大学生参加。时装表演是沪上首开先导,关于北京类似事件的报道多于也早于天津。为津津乐道,引为时尚先导。尤其是化装溜冰会,更是集一时的风光人物于一堂。看来,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北京也决不是一个保守的故都了。天津与北京咫尺之距,不能不受其影响。

3.2 服装商业中心及服饰百年老字号

3.2.1 服装业在商业中心的分布

天津的服装业,绸缎、布料业,百货业的聚集地在二十、三十年代曾经有过一个转移,即从北门外大街一带等地的早期商业中心转移到了法租界梨栈一带的新商业中心。

1920年前后,北门外大街一带是天津早期的商业中心,东门外靠海河沿的娘娘宫前的宫南大街与宫北大街,也是天津早期繁华的商业街道 。北门外大街状呈蜻蜓形。南北向的北门里大街是头部,北门外大街是身躯,河北大街是尾部,东西向的估衣街、锅店街、侯家后大街、洋货街、竹竿巷、针市街是翅膀,很象蜻蜓展翅的样子。[16]

"北门里大街多是金店、当铺,北门外大街最热闹,两旁的百货店、鞋帽店、杂货店、海味店、糕点店、药店、饭馆等鳞次栉比。洋货街、针市街、竹竿巷多是票号、钱庄以及国药、茶叶、棉纱、布匹、竹货、洋广货等批发商。估衣街、锅店街多是绸布庄、皮货店、估衣铺、眼镜店、南纸局等零售商的门市。"[17]

由于二十年代初连遭兵燹掳掠,许多商号认为在所谓的"中国地"是没有前途的,而租界地却可以寻求保护,于是纷纷到法租界梨栈(今劝业场一带)设立分号,于是法租界新的商业中心开始兴起。英租界的小白楼一带也是服装业聚集的地区之一。日本侵华后,老商业中心没落。

另外,西马路也值得一提,西马路商业的发展比东、北马路较晚。到了

30年代有了布头铺后才逐步繁华起来。天津解放时此处的布头铺已成为门市小批发了，商店达300多户，是天津一个重要的棉布市场。[18]

3.2.2 估衣街

估衣业是指转卖败落的大户之家变卖的服装或当铺里成为死当的服装的行业。估衣业的存在是过去港口城市的一个特色。在天津，估衣行里有破旧的衣服，也有绸缎制的较高级的服饰，估衣业的主要光顾者是本地贫穷的较力者、讲究穿得体面的土著商人、为赶节气变化而换装的港口过路劳力。"估衣街上古衣多"，天津的估衣街因估衣行的集中而得名，后来又因商业聚集而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成为天津的象征之一。今天河北道大胡同即天津人所谓的估衣街。估衣街对天津人来说，意义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街，估衣街是天津的象征，天津的代名词。估衣街形成于光绪庚子年间，可谓年代久远。

估衣街全长500来米，宽仅5米左右，为东西走向。[19]

"估衣街从西口到东口，估衣铺就有15家，买卖虽然不大，但家数不少，比较有名的如瑞兴号、德和号、源合时等，其他有华盛号、广义号、同裕号、益德号、义兴合、德茂成、义成厚等等，后来发展的越来越多，延伸到锅店街里边的就有27家，单街子里边有3家，共计45家，占全市估衣行业120家的三分之一左右。一些估衣商从当铺里以低价收买一些当死的旧衣服，在这条街上设肆出卖。一些不太富裕的人家添置衣服时，就到估衣铺买现成的'一伸袖'衣服，既省工省料，又省钱省事，估衣商也能从中获得厚利，因而估衣铺便应运而生，而且越来越多"。[20]除了估衣铺外，估衣街的南北两侧商号林立，星罗棋布，到了20年代，它已进入鼎盛时期。[21]

3.2.3 百年老字号的童年

在天津的商业中心，许多后来闻名中外的鞋帽业的老字号在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建立发展或走向成熟。在估衣街有多家颇有名气的老字号鞋帽店，如同升和、凤祥、清昌顺、长升号、同升义、广聚和、德丰合、晋华鑫、聚升号等，达九家之多，以同升和鞋帽店最为著名。在"七七事变"前，估衣街同升和鞋帽店为总号，每到年节，门市上的顾客总是拥挤不堪，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它的经营特点是真材实料，式样新颖，服务周到，买卖公平，因而赢得了更多的顾客。[22]

另外还有德华馨鞋店，它建立于1912年，于1924年在劝业场一带的商业中心建立分店，图长足发展。德华馨鞋店因选料精良式样好而买卖兴

隆。"那时天津的'八大家'(八大家族)和军阀官僚富绅各大宅门的家属太太、小姐、姨太太、少爷们常来买鞋,日子长了,(德华馨)对他们多大的脚,喜欢什么样的鞋,都比较熟悉……根据他们留下的鞋样、尺码做鞋楦,并编上号、写上姓名,以备使用,同时根据这些数据设计新式样,后来就连家住地址、门牌、电话号码,家里有多少人,排行第几,喜欢穿什么式样,什么花色品种的鞋,统统都一清二楚。"[23]德华馨鞋店主要经营夹鞋、棉鞋、绣花鞋。后来又有了与之竞争的金九霞鞋店,两家对峙"开始,到德华馨买鞋的主顾拥挤不动,而金九霞则冷冷清清。后来金九霞在女鞋上下功夫,提高质量,以花色、样式取胜,争夺一部分主顾,但德华馨也不示弱,马上又研究出来毛葛鞋面鹿皮软底鞋,穿着非常舒适,销路很好……在这一商业中心地带的鞋店还有久恒、久成、天顺、同升合、沙船等几家都以自己的特长取胜,有的是走上海式样的路子,有的是专攻皮鞋,有的是大众化路子,联兴富、洪玉和、源兴润,也都是多年的老鞋铺。"[24]东马路的老字号有沙船和欧亚两鞋店。说起"沙船"和"欧亚"两个皮鞋店来,差不多的老天津人没有不知道的。这两家鞋店都坐落于东马路崇仁宫北侧,是仅隔一个门的近邻,两家的经理还是同族兄弟。"沙船"建立于1931年,鞋的款式沿袭北京的鞋型款式,高档鞋选用进口的面革底革,价格昂贵,迎合外籍人士、官僚买办、绅商富户、高级职员市场。鞋楦设计独特,皮鞋形瘦、美观,不夹脚,舒服抱脚。"欧亚"创立于1937年,其产品用料考究,凡紧要的地方,主跟、反脑、大底、帮面都选用牛皮的坚固部位,做工精细,沿条紧、修底光、除边平。[25]

估衣街上的盛锡福帽店专门经营帽子。1925年改名盛锡福帽庄,始用三帽牌注册商标。1934年自制呢帽坯,生产呢礼帽。1939年在北京、南京、上海、重庆、济南等地开设分号,并在英、德、法、美、意等国设置商行。盛锡福帽庄生产的平顶金丝草帽和兔子呢礼帽在莱比锡国际展览会上均获奖。[26]以后草帽品种又有宽边遮阳草帽,仿呢礼帽的金丝草帽、蜡线草帽、防雨草帽等。呢礼帽自20年代传入后,即被一些官商作为装饰。

眼镜铺主要有玉明斋、老玉明等几家,每天来验光配镜的人很多,是天津较早较有名的眼镜铺。[27]

3.3 着衣方式上的"中庸之道"

二、三十年代的服饰是以融合为最主要特色的。女子剪发可以被视为古典与现代的融合,长袍马褂西装革履、旗袍开衫可以看作土与洋的融合。

3.3.1 女子剪发

清代中后期一直到民国建国伊始，成年女子的发式一直都是髻，(见1.4.1 女子服装）到了二十、三十年代，剪发之风日盛。女子剪发的问题较早曾于1912年经人提倡、被人实行，但肇始虽早，为一定数量的国人所接受却晚一些，到二十年代尚且不成气候。[28]20年代剪发女子的数量开始增加，"女界剪发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了"，曾有杂志介绍德国的电气剪发(《妇女杂志》1920年7卷3 号)，表现出对剪发技术及工具的关心。与此同时，一些讨论女子蓄发与剪发各自的优劣、提倡剪发的文章开始散见于报端。[29]当时力主剪发的人普遍认为蓄发有费时费事、不易清理 、于女子健康不利的弊端。费时费事，显而易见；说其不易清理，有人称，"蓄发不便洗涤，有碍卫生……称什么'秀发如云'和什么'东方人之美在发'还不如说'含垢纳污之具在发'之为得当。"[30] 于女子身体健康不利，是从卫生学角度观察，认为蓄发会使身体因"失体位的平衡而生疾病"——"我国女子到十六岁以上，就要梳头打髻，年壮发多后面就出现许多东西来。这个东西，在白天还不觉得不方便。一到睡时，后头部旋转，就有点不自在，而且不能平贴于枕上，没有法子，只得头向左右侧卧。头已侧向，身也随之，少有仰卧的机位，以调节其偏劳。久而久之，两侧或一侧全膊的神经，筋肉，关节和血管等，因为压迫的缘故，便起了各种疾病。"[31]此外，还有有碍头发生长等诸种弊端，[32]

与之相映，剪发则有好处，"人工的建筑物无论怎样的容壮华丽，总不及山色湖光来得滥远……所以我以为女子的头发能剪短了最好……只要不剃成一个光和尚头，总有办法可以使它美……而且还有一样占便宜的，就是剪了发之后，在冬季可以戴帽子，戴了平整妥帖。"[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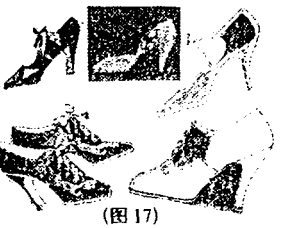
剪发在当时说小是女人的小问题，[34] 说大，则关系到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的问题。[35]当时剪发派是"在野"的，即多为学者之类不当权者，而在剪发初兴之时，当局时常会有剪发禁令。剪发派对蓄发派的女子剪发禁令的批驳是锋芒直露的，指出女性的头发乃至于身姿不是给男性鉴赏的，暗指，蓄发派是出于某些男性的一己之私才申令禁止剪发的。其实，"女子剪发全然不成问题，要剪便剪，要留则留 "。[36]

《妇女杂志》1925年11卷4号有《禁止女生剪发的流弊》一文，针对某省教育行政禁女生剪发，认为剪发有破坏"礼教之忧"，还可能招致" 无知者枉加非薄"一事，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禁者本身"范了衰涕礼教的大罪"，应治罪；"无知者枉加非薄"是"无知者之罪，不是女生之罪"，禁令"导诲淫之习，长奢侈之风，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流弊。"从照片上看，女子剪发越来越不是为人鲜见的现象；从史料看来，剪发与蓄发之争，却持续了十

余年，直到1935年，蓄发论仍有市场。[37]蓄发派提到礼教，不仅是道德上的假道学，实际上从某方面看来，是为了保持某种传统 而蓄发派则是西化的倡导者。剪发与蓄发之争，是自由与强制之争、女权之争，也可以说是中与洋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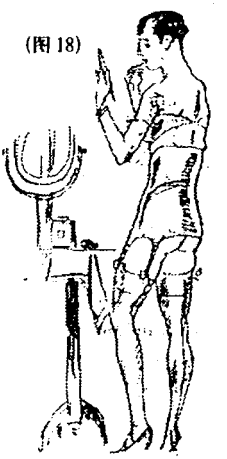
在服饰上，女子剪发的直接后果是女帽的风行。"因为女子有剪发的新趋势，于是女帽便成为一种必需的服饰品"，20年中期，被介绍到天津的帽式有圆顶卷边式、斜翻边式 、直筒式、前翻边式、斜顶式、圆筒式、花阔边式 等，[38]花样可谓繁多。帽子的样式学海外，学上海。(见1.1 海上的影响)

3.3.2 "中庸之道"


(图 17)

20、30年代天津人的着装方式有土、洋、土洋结合三种，所谓土的，在男子是长袍马褂瓜皮帽洒鞋，以这种方式穿着的多是土著商人或门第较高家庭的中年家长，在女子是上衫下裙梳髻，中老年女子为多，传统大家庭的闺秀也有穿着；所谓洋的，在男子是西装革履，教育界人士、洋行职员、门第较高家庭的年轻一辈穿的较多，在女子是西式套裙配以开衫烫发，驻外领使馆家庭的小姐、电影明星、交际界明星常常穿此露面，当时报纸上常有"最新西式女鞋"、(图17)"今年巴黎妇女流行之小帽"、"西妇内衣之沿革"、(图18)"欧西时装介绍"等内容(《大公报》合订本)，介绍西方流行服饰。土法和洋法还以场合分，三十年代新式交际讲究穿西装。[39]有特色的是土洋结合法，男子穿大褂配西裤、皮鞋、礼帽，女子穿旗袍配以针织开衫[40](图19)、高跟鞋，当时人评到，"皮鞋西裤大马褂，烫发旗袍半高跟，不中不西，亦中亦西，谓之为东西合璧可，谓之为文化进步也可，然而这合璧这进化不发生于外国而独见于中华者，固由于中人之善模仿，而主要的理由不能不说是中国人常于'中庸之道'。"[41]

(图 18)



3.3.3 满风已远

(图 19)

(图20a)

(图 20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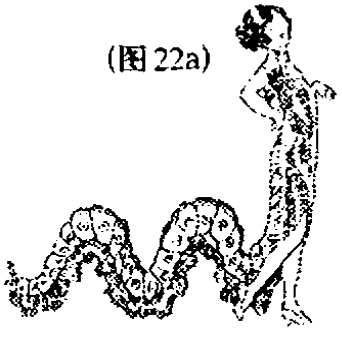
上下连属的袍，是旗人的主要衣着，后被称为旗袍。汉人穿袍，古已有之，但用作女子燕服的还是旗人。清末满汉合流之际汉人妇女仿效旗人女子穿袍，这时往往从头到脚一色的旗人妇女装束 民国之后妇女出于保暖、易穿脱等实用需求开始穿旗袍，不过这时就是拿来主义，舍弃其他装束如大拉翅、花盆底鞋不用。[42]旗袍也被称为旗衫，与旗袍相近的旗袍马甲也是上下连属，但无袖，又被叫做“联褂衫子”，[43]顺治光绪年间，旗人老太太的便服就有长褂外加长坎肩的，[44]民国时期倡导女权，（非旗人的一般）女子穿旗袍也被赋予了与男子平起平坐等意义，二十年代穿旗袍者渐多。[45]民国女子所穿的旗袍开始不开叉，“旗袍之制与男子之袍不同，下摆不开叉，袖口仍如女衣，上狭下阔出手亦较短，且近时衣旗袍者于头上之髻，足部之履，一无更易，或烫发卷如，蛮靴橐橐，衬以旗袍，亦不为怪，秋末冬初，即已有着之者。”[46]从《大公报》上的图片看来，二十年代已有开叉的旗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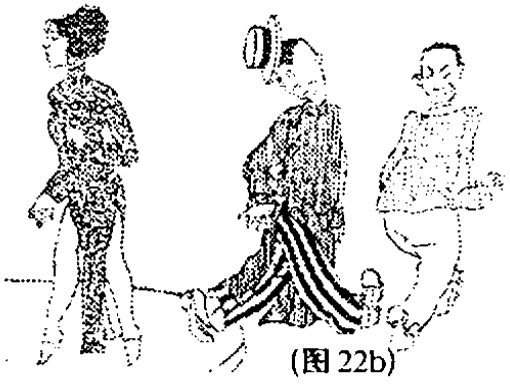
说民初妇女所穿的袍是仿自旗人，一是从时间上推测，是最近的源头，二是因为袍上有与旗人之袍极相近的两个特征——襞和倒大袖。民初不开襞的女袍与旗贵族女子的燕服相近，开襞的则是与常服相近。清代“皇后常服袍和常服褂应为左右大开裾和后大开裾式 ，开裾长度也应为70-85厘米范围内。”[47]天津三十年代的大襞旗袍有开到50-60厘米的。（据何志华说）倒大袖（喇叭袖）也与旗女之袍的袖式相近。（图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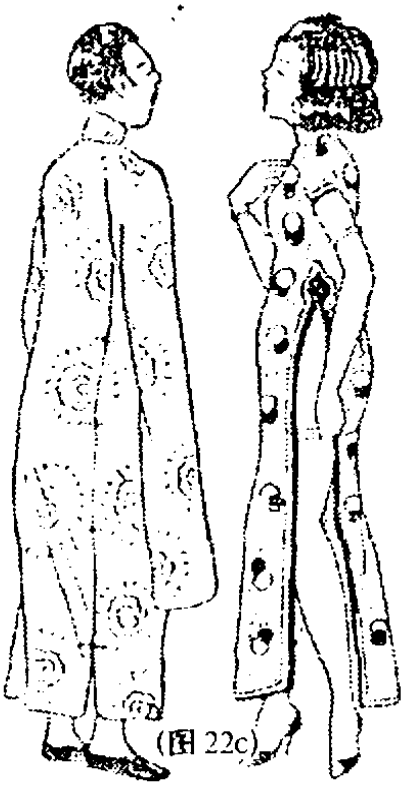
旗袍的改良是一个过程，并不是从哪一个明确的日期开始的。清代袍装清初期瘦，中期肥，晚期瘦，一直有变化。关于改良的时间，有人认为早自同治四年即开始 ，宣统时的皇帝朝袍就已贴身，与现代的审美观点几乎一致，（据故宫研究院房宏俊先生说），由这种观点看来，清代就开始改，民国建立后穿旗袍的人多了，改的程度更大了。其实老舍剧作《茶馆》里的“改

(图 21)

良改良越改越'凉'"一话倒也适用于旗袍，只不过这里的"凉"不是指"冷落"，而是说"凉快暴露"，衣身向瘦里改，衩向长里改。三十年代初开始，大衩长旗袍在天津开始流行，配以高跟鞋、丝袜。《大公报》称，"时下流行之大气长袍，衬以革履，丝袜，行时步趋婀娜，飘飘欲仙。"（图21）《新天津画报》称，"无论在乡间，在都市，随处可以见到短发天足天真浪漫的青年姑娘，她们有的披着短发，有的梳着辫，有的身御长衫，有的腰系短裙，裸着两臂，露着两腿，衣服简朴而清洁，装束通俗而美观。"[48]有的摩登女郎视"鞋跟愈高愈妙，袖口愈短愈佳"，"上身穿着大氅，下身赤着双足……成心不穿丝袜，反在脚面脚胫之上，画上各种花卉"[49]当时，大开衩的长旗袍常被遭诟病。在《北洋画报》中有若干漫画记这一现象，很有几分嘲讽味道。（图22）大衩旗袍　这样的装束距离满人女子的袍已经相去甚远。


(图 22a)


(图 22b)


(图 22c)

3.4 二十世纪二、三十 年代服饰

3.4.1 女子服饰

发式：二、三十年代妇女或梳髻或梳短发，髻有盘在后面的，也有盘在侧面的，梳髻的年轻女子留前刘海，还有人烫前刘海。三十年代烫发的大有人在，也有人留披肩发。发式多种多样，有盘髻的、有留学生头的、有烫发的、有留辫子的，刘海更是变化多端，有的平剪的、圆剪的，有削剪的，有烫刘海的。(图23)

(图23)

首饰：鬓角常戴花，长耳环。留短发的常戴发夹。女子戴珠链，有的珠链带坠。各种扇子，如羽毛扇等很常见。各种西式女帽，宽檐帽和短筒帽最常见。围巾很讲究，多为毛料的，少量针织品。

日常装：二十年代上衣下裙多见，上衣多为大襟，领较高，领子上衣襟处常镶丝绦边。旗袍仍为敞袖，只是程度甚微，也镶丝绦边。袖口有时装饰以荷叶边。

旗袍大行其道，二十年代中后期皆为长及脚踝，平直，合身有裕 ，袖为倒大袖，及小臂中部。旗袍沿边日趋简单，为丝绦边。领子上装饰一道至三道丝绦。三十年代初开始，流行较贴体的长旗袍，与高跟鞋、丝袜相搭配，开长衩。由于旗袍较流行，常见套穿现象，“棉袍，罩袍，裤腿”套穿。“五色具备，极参差之致”[50]

当时人的文学作品所描述的贵妇衣着为花缎旗袍外罩长大衣，高跟鞋

只见由门外进来的雅琴(因当上官太太而富的)，本是娇小玲珑的身材，却好似因为做了太太，身体就变得特别沉重，由一个衣服整齐的中年女仆搀着。她身上穿着印度红色的长毛绒大衣，长度只齐到膝盖以下，露出全花缎

的旗袍，和镂金的小漆鞋。头上长发披垂，烫成最新的希腊式，像个小孩玩具猫狗头似的。脸上显得非常丰满，显示出过着舒心日月，所擦脂粉，好象能够发出光来，使皮肤现着宝色。耳上坠着很大的钻头钳子，一走一摇，她好似故意展览自己的装饰，比那西洋店作模特儿的女子，还走得慢。

一进刘家的门，便见雅琴已换了家常衣服，坐在崭新的炕褥上，吸着纸烟。她这家常衣服，也是湖色软缎，外罩紫花绒的小马甲，好象四郎探母戏中公主似的。这时，女仆正站在地下，替她把高跟鞋脱去，另把一双米色缎绣花鞋穿上。[51]

平民女子穿袄裤，袄沿黑边：

盼望能够巴结上这阔太太，沾一点阔气儿（指生男女），逼着男人上当铺赎出那种假华丝葛的大棉袄。赵大头正值手头没钱，又因还不到穿大棉袄的节令，只答应替她赎夹袄，他老婆因为夹袄是斜纹布的，没有亮光，怕被阔太太看不起，直和赵大头吵了一夜……到了院中，只见韩巧儿已收拾得光头净脸，穿着紫色假哔叽的小夹袄，周身沿着青边，下身是青色假礼服呢的裤子，长到盖着脚面。[52]

常着女子西服的现象：

驰出一辆崭新的脚踏车来，车上坐着个妙龄女郎，身上穿着印度红薄呢的短西装，头上斜戴着雪白的佛兰绒卷檐小帽，头前系着条极大的黄蓝朵色的丝巾，在粉颈上缠了一遭，还有多半幅垂在背后，腿上过膝的极长肉色丝袜，这看直如适腿全部裸露，脚下却是很朴素的鹿皮平底鞋子，带着白羊皮手套的手里，握着只打网球的球拍。这女子的气度装饰，一见便知是个富丽生活的女学生，年纪最多不过十九，面庞在秀媚中带着雅气，尤其那一点猩红的小嘴儿，和里如点漆的大眼儿，全盘表现了他娇纵负气和活泼天真的个性。[53]

(图 24)

运动装：跑步装为背心短裤。泳装为联身的背心短裤或背心短裙，(图24)常为针织面料，常织有条纹。在沙滩上常披浴巾。

鞋：主要是丝、布履，高跟皮鞋也很普遍，有带或襻，尖头为多，有平跟、中高跟、高跟，一色或有花饰。

3.4.2 男子服饰

发式：男子发式主要为平头、背头。

鞋：革履较多，另有体操鞋、体育靴鞋。(图25)

帽：有瓜皮帽、西式礼帽，礼帽形式多样，有英式皮帽、美式皮帽、时式呢帽、学界便帽等。(图26)

(图25)

饰品：怀表，手杖。

服装：传统的衣着是黑色马褂浅色长袍。各业人士衣着大异其趣，小买卖人平日着装简陋。公司职员穿长袍马褂。

面目清整，仪容端重，身穿哔叽长袍，青礼服呢马褂，看上去是做高尚职业的局面人。[54]

年轻人穿西装的很多，装扮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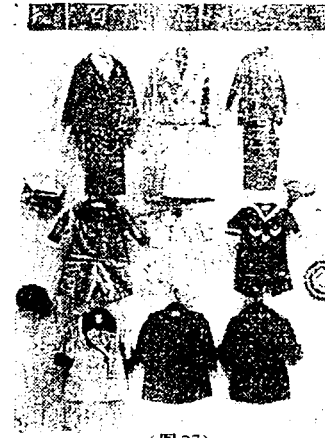
只见一个少年由外面闯然进入……，他身上穿着葡萄紫色西服，脚上是油亮的皮鞋，胸中坎肩的小口袋中，露出花花绿绿的丝巾角儿，散着香气，和头上司丹康的芳馥，弥漫全屋……青年男子，他下身穿着灰呢西装裤，上身却只着白领的绒线衬衣，这时他一手插入裤袋，一手定车的横梁……(55)

(图26)

3.4.3 儿童服饰

儿童多留短发，女孩常穿小旗袍，长及小腿中部，穿连衣裙的小女孩很常见，有用中式小袄配西式塔裙的。儿

童常被打扮的象洋娃娃。有儿童商店专售童装。(图27)婴儿仍多按传统方式装扮，戴红色肚兜。



(图27)

那时侯中国最时髦的地方不是北

注释：

[1]《时髦人生》，林希著，选自《老天津》，天津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第183-197页

"天津人也好赶时髦。在明代定都北京后，北京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时髦城市。北京虽然有紫禁城，但紫禁城外，却是一片土气，若干年来，北京不仅是城建上守旧，北京人的观念也守旧，所以京，而是天津。"

[2]《时髦人生》，林希著，选自《老天津》，天津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第183-197页

[3]《大公报》，1935年6月22日，星期六，第11版，合订本126卷

"自海禁开后，'京装''苏式'的权威便让上海装夺去，南方底'粤装''港装'，也可以看为上海装的一支派。所以近五十年来，上海实是操纵中国妇女装饰底大本营。近年电影业发达，上海底女明星无形中成为时式底权威者。在此以前是妓女，更前是官家。这时式权威底流转也可以看为衣服材料日新月异，女子与外界接触渐多，衣服底禁令不如从前那样严格所致。但是我们所谓"时式"只就通都大市而言，至于穷乡僻壤，服装底相差有时会在一百五十年左右！上海女人烫发著高跟鞋底时候，河北三河底太太们，还在戴三四百年前底冠子，缠上一双四寸半底三角粽式金莲。北平女人著贴身长旗袍底时候，甘肃地方还有三十前上海时兴底二重镶滚底袖子。"

[4]林希著，《时髦人生》，选自《老天津》，天津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第183-197页

"到了清代末，天津不算是最时髦的地方，最时髦的地方应该说是上海。但是，到底是上海距离天津远，上海再时髦，毕竟在东南一隅。所以，尽管天津不如上海时髦，但那时候的天津人却不肯学上海，因为天津人以为自己才最时髦。"

[5]林希著,《时髦人生》,选自《老天津》,天津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第183-197页

[6]林希著,《时髦人生》,选自《老天津》,天津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第183-197页

"它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兴时髦和赶时髦,全都是从时代女郎的,时代女郎们永远是时髦的标志。30年代,上海出了一种'美丽'牌香烟,但是在天津,天津的'前门'卖不过上海的'美丽'。其原因,就是上海'美丽'牌香烟的烟盒上画的是一位大美人,这位大美人独具东方特色,身穿中式旗袍,头发电烫卷花,以中国式的娇态坐在椅子上,满脸中国式的微笑。就凭着这个香烟盒上的大美人,'美丽'牌香烟几乎占据了天津的大半个市场。而且'美丽'牌香烟的侵入,掀起了天津女性向上海美女们学时髦的热潮,'美丽'牌美人的装束风靡一时,看着也煞是壮观。……

电影30年代,上海的电影事业大发展,大批在上海制作的影片占据了全国的电影市场,这一下,不仅使人们看够了上海人的生存状态,它更使人们接受了上海人的价值观念。应该说,上海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和上海电影分不开的。"《老天津》天津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 林西著文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时髦人生》P183-197

[7]林希著,《时髦人生》,选自《老天津》,天津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第183-197页

[8]锐成著,《女子剪发之面面观》,选自《国文周报》1926年7月4日

[9]《国闻周报》,1924年-1925年

[10]《国闻周报》,1924年10-12期

[11]《女子的装饰美》,选自《国闻周报》,1926年3卷1期

[12]林希著,《时髦人生》,选自《老天津》,天津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第183-197页

[13]《记所谓北平秋季化装跳舞会》,《大公报》合订本十一卷,535期,1931年10月9日3版》

[14]《大公报》十二卷,581期,1931年1月7日2版

[15]《大公报》十二卷,555期,1930年11月5日2版

[16] 王绣舜、张高峰著,《天津早期商业中心掠影》,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1页

[17]王绣舜、张高峰著,《天津早期商业中心掠影》,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11页

[18]李思九著,《回忆西马路的棉布市场》,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90～91页

"早在20年代西南城角外面还有庄稼、坟场，附近只有一些小商贩和卖苦力的人。贫苦人多用汤布包皮布擦汗，因此出现了卖汤布的。在这个时期，日本大量向我国倾销布匹，日产的'世乐鸟'布已把英国的'军人枪'白布和青岛产'双龙珠'白布挤出了华北市场。日本商品占据了市场以后就把本国废弃的布头、碎布也运到中国销售。布头刚运到天津时找不到销路，于是有卖汤布的静海县人杜明友、李宝善、吴振吉和专收成衣铺'地道子'的辛玉庆、郭洛善等五人商量要把这批布头买下来。他们五人装作互不认识，分头看货后，便以较低的价钱把那批布头买了下来。这五个人因为没有正式的铺面，就把货运到了西门南的小客栈德成店，起初在德成店周围出现几个小门脸，辛玉庆伙同他人在西门北开设了三合成布头铺，这就是西马路布头铺出现的开端。此后在西门北有出现六七户'倒码家'，所谓'倒码家'也就是降低批发起点，使本钱小的商贩可以买零码的，以便多购进几个花色品种。日商运销布头消息被天津批发商（俗称来货家）知道后，恬信、大瑞、大同等几家就派人去日本大阪进货，货运到国内也销到了西马路。"

[19]谢鹤声、刘嘉琛著，《六十年前的天津估衣街》，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74页

"西口靠北大关，直对竹竿巷，斜对针市街；东口与锅店街衔接，经单街子，可达大胡同、大经路、北站，也可通往毛贾黑巷、老铁桥、宫大街一带；南邻北马路、大经路、北站，也可通往南运河南岸。它以估衣街金店胡同为界，迤东为锅店街，再往东行则为单街子，三街相连，直贯东西，形成带状。中间有归贾胡同、金店胡同，可通候家后、鸟市、肉市、小马路、鱼市一带。"

[20]谢鹤声、刘嘉琛著，《六十年前的天津估衣街》，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75页

"估衣铺的货源，主要是从当铺打当出来的当死的旧衣服。当年一些有钱有势人家的不肖子弟，终日吃喝嫖赌，穷奢极欲，一旦落魄穷困，只好把夏葛冬裘、鲜衣华服值十当五地送进了当铺，按规定18个月期满，月息二分八厘，到期无力赎回，就变成了死当，当铺打当时，由估衣铺低价收买，再以高价售出，从中牟取暴利，大发其财。这些估衣铺从每天早晨到日没，门前铺着大张苇席，席上摆着一大摞估衣，每件估衣上的下角缀着'飞子'，上边写着暗语，叫作'暗春'，这是估衣铺的行话。为了便于讨价还价，牟取厚利，把钱数从一到十，用暗语密码代替为'肖道挑福乐前贤万世青'10个数

字，非本行家看不懂，只有估衣铺的同行彼此知晓，用此来向买主漫天要价，买主只要一张口还价，就很容易上当。不仅如此，还南腔北调地吆喝着，叫作‘估衣’，合辙押韵，诙谐动人，把估衣翻过来掉过去，一唱一合，引人发笑，使围观的人们越聚越多，其中或有买主上钩。估衣街上估衣铺一家连着一家，和估衣声、讨价还价声，吵吵嚷嚷不绝于耳，使估衣街显得更加火爆。估衣铺的买卖，不仅是靠门市上‘喝估衣’，更多的销路是靠批发销售给外地农村乡镇‘外客’，他们大批买去以后运到农村，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21]谢鹤声、刘嘉琛著，《六十年前的天津估衣街》，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75－76页

“根据1931年9月的统计，在不太长的估衣街上共有19个行业，约有110家店铺，当时的繁荣景象是可想而知了。当时著名的大商号不少，仅绸布棉纱呢绒业就有27家（包括门市10家，内局批发17家）号称‘山东孟家’的八大祥绸缎庄，在估衣街上就占了五家，如谦祥益保记、瑞蚨祥、瑞蚨祥鸿记、庆祥号、瑞林祥等，瑞蚨祥和谦祥益在全国也是排得上名次的大商号；还有天津八大家的乔、纪两家合资的敦庆隆绸缎庄、华竹绸缎庄、老九章绸缎庄等。像这些赫赫有名的大绸缎庄，在估衣街上就有10家之多。另外还有批发商，如德义成、庆德成、崇庆号、贻庆号、宝昌号、荣馨号、荣庆号等17家。它们都是资金雄厚、根深蒂固、规模宏大、庄重典雅的大商家，这些商家陈列的各种绫罗绸缎、呢绒布、花色齐全，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裘皮柜陈列的各种高级细皮货更是五光十色，使顾客爱不释手，有的还设专柜出售男女寿衣、袍褂靴帽、海獭、海被、凤冠霞帔，高、中、低各档次样样俱全。凡是别处买不到的品种，到这些家来买，保证能买到。”

[22]谢鹤声、刘嘉琛著，《六十年前的天津估衣街》，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77页

“同升和原在估衣街中间，坐南向北的一间门脸，是1912年有莫荫轩等人创办，后来改由李溪涛、王质甫、郑耀庭、莫泽林、张伯衡等五位经理接办，同心协力，惨淡经营，到‘七七事变’后，逐步向法租界转移，发展成为一个总店，四个分店的大鞋帽店。他们派专人到京奉、津浦、京绥铁路沿线各省、市、县、乡镇、农村去张贴广告宣传，招徕各地广大顾客，外地销路非常旺盛。在‘七七事变’前，估衣街同升和鞋帽店为总号，每到年节，门市上的顾客总是拥挤不堪，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它的经营特点是真材实料，式样新颖，服务周到，买卖公平因而赢得了更多的顾客。”

[23]张绪端著，《天津老字号鞋店德华馨》，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69～172 页

“德华馨鞋店在天津是久负盛名的，不仅为本市人所熟悉，而且在外埠也很有名，自1912年开业，至今（1997年）已有85年的历史，设立在天津市最繁华的东北城角大胡同地区 924年，赵梓轩打算在繁华商业中心——天津市场楼下设立德华馨第一分店，得到洽源银号股东张云铎的支持，把天祥小市场的门面房子优先租给德华馨。

在选料方面，赵梓轩要求坚决不用次料，不能以次充好，专料专用，做鞋面的料子不能做鞋口，做鞋口的料子不能做鞋面。检验由经理亲自把关，按工序负责，出样子这一关最难，它关系着这个鞋店的命运，样子搞得好，销路就好，买卖就兴旺，搞不好就造成滞销，甚至赔本亏累停业。那时天津的‘八大家’和军阀官僚富绅各大宅门的家属太太、小姐、姨太太、少爷们常来买鞋，日子长了，对他们多大的脚，喜欢什么样的鞋，都比较熟悉。赵梓轩根据他们留下的鞋样、尺码做鞋楦，并编上号、写上姓名，以备使用，同时根据这些数据设计新式样，后来就连家住地址、门牌、电话号码、家里有多少人，排行第几，喜欢穿什么式样，什么花色品种的鞋，统统都一清二楚。”

[24]张绪端著，《天津老字号鞋店德华馨》，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69～172 页

[25]刘景波著，《沙船与欧亚鞋店》，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173～176 页

“1930年春节前夕，刘景荣、刘景贵哥俩合计着用积蓄的钱也干个前店后厂、自产自销的皮鞋店，因为当时皮鞋行业正欣欣向荣。不过在北京干，肯定敌不过瑞华的声望，就决定到天津去，天津市场大，又有租界地，必定比北京有利可图。

1931年2月1日正式开业，亮出招牌是‘沙船皮鞋店’。沙船开业正好是春节前夕，所以生意兴旺一时。顾客买了沙船的皮鞋也都满意，因为沙船的产品，仍宗着北京的鞋型款式，用料考究，做工精细。高等鞋特选用进口的面革、底革。这种鞋质高价昂，迎合外籍人士、官僚买办、绅商富户、高级职员的心理，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一般鞋也采用国内名厂的优等革皮。但无论是进口皮还是国产皮，其做法毫无两样，同样是坚固耐久，价格便宜，适合大众的需要。沙船的鞋，再一特点是在缝制上下功夫。麻绳用的是温州

产的苎麻，纤维长、柔软性强，再打上松香腊，绱鞋时用较细的锥子通眼，因线粗眼细再有松香黏性，所以拽线时发出来吱吱的响声，然后还用榔头把针眼砸死，使鞋形成了一个整体。这样绱出来的鞋可以保证不开锭，不变型，不走样。所以他们贴出广告，说买沙船的鞋，半年内出了毛病也保修、保换。……（后来刘景波）增添了按顾客脚型划样定活的新业务，并且不收定款，约期交活，此举深受用户欢迎，招徕来了不少的顾客。第二步印制了各种款式、型号着色的皮鞋样本，约有五六十种之多，顾客买鞋时赠送一本，外地邮寄时还放两本以广告宣传。第三步广泛征求顾客意见，改善鞋的质量。有位学生说：'我们没收入，买双鞋不容易，为了节省，买了新鞋先钉鞋掌，如果你们能钉上鞋掌再卖就方便多了。'他们听后，马上通知师傅照办，获得同学们的欢迎，但教师们又不同意了，他们说皮鞋钉掌，走起路来嘎噔响，不但难听还损坏地板。后来，他们又在鞋掌上粘上一层耐磨的胶皮，这一改进声音完全消失了，使得顾客都很满意，赢得'活告示'的宣传，更增大了销货量。此外，他们还特别注重鞋楦的保密，因为沙船的皮鞋形瘦、美观，不夹脚，舒服抱脚，绝窍在于鞋楦。因之，使用鞋楦时拿出来，不用锁起来，甚至修理鞋楦还得把师傅请来，就怕样子外传，沙船不能独其专了。"

"欧亚皮鞋店的创始人就是刘景波。1937年刘景波与其弟刘景桐离开了'沙船'。欧亚的鞋不但保持了沙船的特点，刘景波还大力提倡'求新'、'求实'。'新'表示款式新颖，'实'表示真材实料，所以他们用料考究。刘景桐亲自下料，凡属要紧的地方，主跟、反脑、大底、帮面等，都选用牛皮的坚固部位，一点都不迁就。做工也更精细，沿条紧、修底光、除边平不怕费工夫。另外在接待顾客上也出了新招，顾客进店，有人拉门，还帮顾客系鞋带。买妥后，随赠鞋油一盒、备用鞋带一副、鞋样一本。其他如邮购外寄、划样定活等仍本着沙船的作法一样不减，经营灵活赢得了顾客的信赖。"

[26]《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纺织出版社，第172页

[27]谢鹤声、刘嘉琛著，《六十年前的天津估衣街》，选自《天津老城忆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73－84页

[28] 毛子震著，《女子剪发问题的意见》，选自《妇女杂志》1920年6卷4号

"女子剪发这件事，在民国元二年的时候，已经有人提倡过，并且也有人实行过了。不过国人怯于进取，旧俗难以骤除，所以至今还没有成为风气。"

[29]毛子震著，《女子剪发问题的意见》，选自《妇女杂志》1920年6卷4号

"近来思想界略为有点变动，对于从前的行为和习惯，大家都加以讨论

女子剪发的问题也算其中的一个。例如晨报上的《妇女们应该剪发》和曙光杂志里刘静君女士的《女士剪发问题》，都是平心静气实实在在去讨论这个问题的利害的；而且都主张要剪发的。他们所持的理由：（一）梳头太费时间；（二）蓄发太不清洁；（三）梳头不利女子人格的保存。这些理由，固然是不错。不过再进一步说，自然逃不出美术和医学的范围。”

[30]毛子震著，《女子剪发问题的意见》，选自《妇女杂志》1920年6卷4号

[31]毛子震著，《女子剪发问题的意见》，选自《妇女杂志》1920年6卷4号

[32]毛子震著，《女子剪发问题的意见》，选自《妇女杂志》1920年6卷4号

“天寒脱去衣服或伸出两只膀子‘易得害病的机会’；梳头费时，除了少数无所事事姨太太或娼妓，大多数的女子‘妨碍精神的休息’蓄发有生发、假发等许多麻烦……妇女们对于梳妆头发这件事情，很喜欢勾心斗角，出奇制胜的。有人统计上海的头式有三百多种，这种应有尽有的样式，可说尽美术上的能事了。不过一面要好看，一面便要受痛苦。因为头发有一定的性质，而讲究美观的人，只求其美观，什么东西都不管，例如今天梳前额部的蝶形髻，后天又改梳两耳后上方的圆形分髻，叠回变更，发性不定，头部的痛苦，事实上是不能免的。……换一回头式，头部就有一两日的不舒服。……（发髻）讲究光泽，发可鉴人，苍蝇落在头发上站不住，就用生发油润发膏和润发水等等，另有卫生上其它的弊端……”

[33]钟冰女士著，《女子的装饰美》，选自《国闻周报》1926年3卷1期

[34]《女子的头发到底该剪不？》，选自《大公报》1926年11月28日

“女人身上的小问题，用不着费这么大事。”“其实外国女子如今正风行穿中国装。可见得女子的装束，本没有一定，只要是美，只要自己以为美，那就成了风气，谁都没有切实解决的办法的。”

[35]沈璇仙著，《女子剪发后的问题》，选自《妇女杂志》1920年6卷10期

“现在女界剪发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了。但是发虽剪去，他们的习惯，仍然未改；这不是徒有皮毛了么？……女子剪发之后，切不可再着那些妖艳衣服；因为这些衣服都是自居玩具的表示。现在既然把头发剪去，足见有革面洗心的决心。所以那些奇装异服再也不能着了；最好着些淡素衣裳，表示简朴的意思，还可以做国人崇俭的表率；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二是女子剪发后再不可戴那些金银首饰；什么手镯呀，颈练呀，一概都要弃置弗御。好让国内多出一笔现金来去铸金币。如此一来不是于金融上面，很有益的吗？第三是女子剪发之后，切不可再迷信神佛；要有一种自信的精神。就是遇见最疑

难的问题也要自己朝前接决前力进 绝对不可求神问卜,决此疑团使男子在旁非笑的?第四是女子剪发之后,切不可再无国家的思想。因为从前女子日处深闺,无一有国家思想;所以男子也就因为这些上面,看不起女子了。须知国家本是男女公共的,并不是男子独有的,男女一齐着力,同来扶助国家,那是再好没有的了。若是上列诸端,一件不能办到单把那头发剪去,便以新妇女自居,庸人自扰,那还不如不剪的为妙哩。"

[36]《教育部禁止剪发》,选自《妇女杂志》1920年10卷2号

"头发若从人类学上考察起来,在两性生活却有重要的意义。……有些人说,妇女头发是美的东西,如果把它剪短,未免要减少美好。这种议论很有许多人信从,但他们却不知道物类的进化为雌雄两性,别有意义存在,决不是为供异性赏鉴的,简单说,便是天生妇女并不是给男性的赏鉴而设的,即便短发确实能减少美观,如果本人以为减少美观好,那么,旁人也决没有理由可以横加干涉的。"

[37]《女子剪发之风将稍减》,选自《新天津画报》,1935年7月27日

"自从妇女盛行剪发,现已由都市流行到乡村,剪发的初意,原为省钱,不想到了现在,反成了费事费钱了,摩登女子每剪一次发,烫一次发,起码就得好几个钟头,手术费由数元以至十数元,明明是一个中国人,偏要学外国人的样子,把一头平顺光滑的青丝,故意弄成了曲曲弯弯,好象一团乱草"

"前年某中委说剪发女子好象赤发鬼,招惹的女英雄们大不满意,最近某要人又通令所属公务人员,不许与剪发女子结婚,一般富于虚荣心或以结婚为对象的摩登女子,突然受此限制,得不着封侯夫婿,从今以后剪发烫发之风,将因之稍减,亦未可知。"

[38]《女子头部装饰谈》,选自《大公报》1926年9月2日

[39]《北洋画报》,12卷584期,1931年2月3日周二2版

[40]《国闻周报》,1924年10-12期

"时妆小志(五)

(E)毛冷绒绳衫。女学兴后,冷绒绳织品大流行。始犹只用之于小儿鞋、帽、及妇女之围巾。近二三年来,愈推愈广。妇女秋之交,多织为毛冷衫或马甲,用代外衣,以御薄寒。

(A)毛冷衫。其式较通常之衣为长,左右下袂,各有一袋,周围以异色之绳结为边,腰际系一束带,与边同色。领或圆、或方、或外翻。钮用骨制者,或不用钮,而以绸带为结,亦甚雅致。

(B)毛冷马甲。其织法与衫同,惟无袖,周围亦以异色绒绳织为缘,下方亦有两袋,用以置物。或插手取暖。腰际亦多加一束带。此二种衣着学校中人物服者最多。"

[41]《新天津画报》，1934年5月6日

[42]《国闻周报》，1924年

“中国妇女向着短衣、长裙、所以示不与男子相齐也。妇女之着长袍，自满洲入关始。旗人妇女多衣长袍，清末汉人之时髦妇女偶有效旗装者，然不多也。且必并其两把头花盆底之鞋，而一致效之。民国而后，汉人之妇女，忽竞尚旗袍取其腿部能暖也。始于曲巷倡家，渐至大家闺秀，冬令皆著旗袍，以御寒气。

旗袍之质料无定绸缎绒呢皆可，四周多加花边其里面或驼绒或丝绵或各种皮毛要视其所着之时令为断各因其宜，无一定也。”

[43]《国闻周报》，2卷20期，1925年 “旗衫之制仿自旗袍”

[44]许地山著，《近三百年来中国底女装》（下）（续五），选自《大公报》合订本126期，1935年6月22日，星期六第十一版

[45]《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服饰研究》，郭惠娟

[46]）《国闻周报》，1924年

[47]房宏俊著，《清代皇后常服考》，选自《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3月

[48]《大公报》、十八卷，869期，1932年12月13日“时下流行之大气长袍，衬以革履，丝袜，行时步趋婀娜，飘飘欲仙。”《新天津画报》.民国二十三年9月3日、《现代姑娘》“无论在乡间，在都市，随处可以见到短发天足天真浪漫的青年姑娘，她们有的披着短发，有的梳着辫，有的身御长衫，有的腰系短裙，裸着两臂，露着两腿，衣服简朴而清洁，装束通俗而美观。”

[49]《妇女未来之装饰》，选自《新天津画报》1933年4月22日

“ 鞋跟愈高愈妙，袖口愈短愈佳，上身穿着大氅，下身赤着双足……成心不穿丝袜，反在脚面脚胫之上，画上各种花卉”

[50]《北洋画报》合订本十八卷869期1932年12月13日2版

[51]刘云若著，《旧巷斜阳》，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1 1月第18页 刘云若时民国时期天津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其作品是在大量的考察之下写出的，以贴近天津社会生活而著名，其对服饰的描写细致真实，很少用夸张的手法。因此，论文作了大量引用。

[52]刘云若著，《旧巷斜阳》，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1 1月第3页

[53]刘云若著，《旧巷斜阳》，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1 1月第81页

[54]刘云若著，《旧巷斜阳》，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1 1月第34页

[55]刘云若著，《旧巷斜阳》，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5年1 1月第21页

4 结束语

天津近半个世纪的服饰变迁，可以被视为一场由外而内、由中而及于上下的变化过程。

说它由外而内是因为清末改变天津人的衣着数量与质量的洋货，打开天津人视野、改变天津人穿着观念的租借地文化都是因开埠而由外国人带来的，租界文化在天津近现代文化中占有不能忽视的地位，天津人装束上洋化进程的深入，天津人对于洋货的崇尚，对于着洋装的擅长都是与华洋共处的环境有关联的。

说它由中而及于上下是因为清末由于"现代战争和国防的需要，促成了一个拥有特权的军人阶层的兴起。""军人从一种地位较低的单纯职业性集团，变成了一只有影响的社会力量。"[1]清末接触西方的另一个后果是"为了适应同外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权阶级内部还形成了一些新的集团。他们的共同事业就是洋务，这不仅包括直接办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进行的一切交往。"他们是"参加官方谈判的专家"、"同官方洋务专家相似的谙熟洋货经营的商人"、"通过制造出口商品和返销洋货而发财的商人"、"现代公司的股东"，此外，还产生了"一个西化的知识界"。[2]正是这个与以往皇亲国戚不同的中层阶级扮演着特权阶层的角色。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天津有着很深的北洋军阀的背景，加上它是由来已久的商业城市，商界势力、军界势力在这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诸如小洋楼文化、西服文化等有特色的清末民初天津地域文化主要都是与这些人分不开的。

"由外而内、由中而及于上下的变化"从某个角度来说可以用来概括整个中国的近现代服饰史，但天津地区经历这一过程天津服饰的地域性还表现在除了洋与土融合，天津本地还上演着南北礼仪融合、内地与港口风俗交融等多幕剧，衣着上的南礼与北礼不同之处的体现，沽上、海上、上京三地的互动等都说明，多样共存、居中调和是天津服饰之所以为天津服饰的关键所在。

注释：

[1](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619页

由于新军"没有传统文人教育造成的偏见，而且一般都甚至必须维护秩序和政府，他们往往成为引进西方技术的强有力的鼓吹者。"

[2](美)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628-645页

参考书目：

[1]林希著，老天津，天津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供稿，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

[2]刘云若著，旧巷斜阳，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南开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天津老城忆旧，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

[4]国文周报，天津

[5]大公报，天津

[6]新天津画报，天津

[7]妇女杂志

[8]故宫博物院院刊，北京

[9]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著，中国近代纺织史，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9月

[10]宋则久著，西装服制礼俗考，天津国货售品所印行，1932年11月

[11]刘云若著，粉墨筝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12]袁仄、区伟文著，历史抉择的服饰——有感于民国初年的服制法令，选自《饰》1998年第1期

[13]冯骥才著，三寸金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

[14]郭慧娟著，民初京城旗袍流变小考，选自北京服装学院学报艺术版、饰，1999年，总第13期

[15]林希著，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7月

[16]张鸿来著，婚礼杂说，文化学社印行，1928年2月

[17]津门杂记·天津事迹纪实闻见录，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

[18]女界慈航，天津商报馆印，光绪丙午年夏五月

[19]历史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20]冯骥才著，阴阳八卦，中国曲艺出版社，1989年3月

[21]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1993年7月

[22]来新夏主编，天津近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

[23]华鼎元辑，梓里联珠集，张仲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24](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5]顾道馨著，试从传统社会心态剖析天津区域文化，天津文史，1997年6月第19期

[26](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7]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

[28]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天津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

图　录

1 天津租界区域划分示意图　选自《天津人口史》
2　A 苏州撅　平三套　喜鹊尾　选自《大公报》1935年
　B 苏州撅　选自《近代天津图志》
3 额角形式　圆满　垂幔　选自《大公报》1935年7月20日
4　A 白罗女褂　选自《近代天津图志》
　B 大镶大沿女褂　选自《近代天津图志》
5 清末天津儿童的各种发式　选自《近代天津图志》
6 A 百家衣　选自《近代天津图志》
　B 儿童饰物　选自《近代天津图志》
7 花衫子　选自《近代天津图志》
8 响铃裙　选自《近代天津图志》
9 SAFARI JACKET
10 新婚图 选自《河北省国货陈列馆国货年刊》
11 联裙衫子 选自《老照片·服饰时尚》
12 袄裙 选自《老照片·服饰时尚》
13 袄裤 选自《老照片·服饰时尚》
14 女童连衣裙 选自《老照片·服饰时尚》
15 A 上海月份牌　选自《老天津》
　B 美丽牌香烟月份牌　选自《老月份牌》
16 海上新装 镂花履 选自《国文周报》
17 最新西式女鞋图 选自《北洋画报》
18 西妇内衣之沿革 选自《北洋画报》
19 毛冷绒绳衫 选自《国文周报》
20 A 慈禧常服 选自《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
　B 清代满族妇女旗袍 选自《旧中国掠影》
21 大气长袍 革履 丝袜 选自《北洋画报》
22 A 女子长袍的将来
　B 男子颈部将来之进化
　C 男女服装的将来　选自《北洋画报》
23 女子发式 选自《北洋画报》
24 女子泳装 选自《新天津画报》
25 运动鞋　选自《河北省国货陈列馆国货年刊》
26 男帽　选自《河北省国货陈列馆国货年刊》
27 童装　选自《河北省国货陈列馆国货年刊》
28 A 溥仪在天津
　B 溥仪婉容在天津　　选自《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